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丘吉尔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丘吉尔传

X X X 编著

目录

一、玩劣学童·····	4
二、军旅传奇·····	15
三、年轻大臣·····	32
四、坎坷仕途·····	57
五、临危受命·····	98
六、晚年岁月·····	149

1965年1月24日，星期天8点钟，800万伦敦市民突然从收音机的临时广播里收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英国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一代伟人温斯顿·丘吉尔逝世了。播送了丘吉尔逝世的消息后，电台播放起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的部分录音：“……我所能贡献的只有血汗、辛劳和眼泪。要问英国的政策是什么，那就是不论在海上、陆地，还是天空，都要全力以赴地战斗下去！要问什么是英国的最终目的，那只有一个，那只有一个，就是要获得胜利！……”

这雄壮、坚强的声音把人们带回到25年前的那个时刻。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酣。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并正准备攻占英伦三岛。然而，英国却没做抵御德国的军事准备。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丘吉尔出任了英国首相。正如在就职演说中讲过的那样，他竭尽全力，率领英国人民英勇战斗，使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播完演说录音，电台又播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胜利的音乐——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悬挂在国会、议会大厦上的英国国旗降下半旗，每个教堂都鸣响着悲哀的钟声。整个伦敦街头似乎凝固了。海德公园凯特大街28号丘吉尔的家门口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以威尔逊首相为首的大臣、各国使节、生

前好友的吊唁车辆把道路都堵塞了。

在丘吉尔灵前，前来吊唁的威尔逊首相赞叹道：“温斯顿·丘吉尔阁下亲手创造并谱写了历史。”在丘吉尔家门前聚集着几百人，一位绅士拉着身旁的两个小学生问道：“你们知道丘吉尔是什么人物吗？”小学生不知所云，这位绅士说：“是拯救英国的伟人啊！他决不仅仅是英国的，而是尊重自由的全世界各国的救星。丘吉尔阁下90年的生涯恰好谱写了一部20世纪的历史。全世界失去了一位尊贵的伟大人物！”

被人们称为创造历史、谱写历史的丘吉尔！被人们讴歌为用生命谱写20世纪的丘吉尔！让我们再次回顾丘吉尔那充满冒险和奋斗的非凡生涯，去探索他获得人们由衷赞歌的奥秘，也去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吧！

一、玩劣学童

如果人们以为凡是伟人，他的青少年时代肯定也是出类拔萃，充满非凡色彩的话，那么对于丘吉尔来说，人们肯定要失望了。在学童时代，丘吉尔不但没有表现出什么非凡气度，反而经常被认为是个有问题的孩子，是一只不被人看好的“丑小鸭”。

丘吉尔的出身极为尊贵，他的家族在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

每当提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时，我们立即想起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是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其实，在17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他是本书主人公的同姓同名祖先。这位温斯顿·丘吉尔（1620—1688）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向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资产阶级领袖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和新模范军，同国王的保皇党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非贵族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却站在贵族一边，

拿起武器为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仗。克伦威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势力，而历史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控制下的国会判处了死刑，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背运的保皇党军上尉温斯顿·丘吉尔只好带着伤解甲归田，并且受到了胜利者的惩罚，被迫缴付446英镑8先令罚款，这在当时几乎可说是一笔巨款，丘吉尔家因此而破产了，他只好跟着妻子住进了德雷克庄园。在这里，丘吉尔上尉埋头从事皇家政权渊源演变的研究，在此中寄托自己复辟君主制的企盼，希冀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

温斯顿·丘吉尔的期待并非是一厢情愿。1660年，查理二世从多维尔登陆，在英国复辟了君主制。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带着自己花了10多年时间撰写成的皇族家谱学手稿前往伦敦，以谋求出路。他对英国王室的忠贞不渝终获报偿：他被选为议员，并出任爱尔兰地方官，后来回国，专门负责掌管王室财产。虽然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眼里，他是一个“一直闲居白厅的穷困潦倒、渺小可怜的骑士，由于他发表一部歌颂君主制和君主的索然无味、矫揉造作、早已被人遗忘的书而被人嘲笑”，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位英国一代名相的同名祖先，为丘吉尔家族的贵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查理二世封温斯顿·丘吉

尔为爵士，并赋予他持有自己族徽的权力。他为丘吉尔家族选择的族徽“忠诚，然而却不走运”，至今仍是该家族的座右铭。

温斯顿·丘吉尔一共有12个子女，其中7个夭折，其余的则都十分健康且聪明能干。其中尤以女儿阿拉贝勒和儿子约翰·丘吉尔最为出色，把丘吉尔家族带入贵族行列的，正是这位约翰·丘吉尔。

约翰生于1650年，据说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少年时就能阅读法语的兵书，在与老师议论时会驳得老师哑口无言。约翰15岁时被选拔为王子近卫队的旗手，屡建奇功。28岁那年同国王的二女儿安娜的侍女结婚，深得安娜公主的信任。以后在许多次战斗中功勋卓著，1688年被晋封为贵族，封为伯爵，号称马尔巴罗伯爵。不久，安娜公主当上了英国的女王。当时英国同德国、荷兰、葡萄牙联合同法国的路易十四对抗。对马尔巴罗寄予极大信任的安娜女王任命他为英国军队总司令，他同时作为英国、荷兰等国的联合军总司令，在欧洲大陆给法国军队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多瑙河边的布伦海姆战役，彻底击败了法国主力军，打死打伤敌军3万人，俘虏1万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

“英国有马尔巴罗伯爵，法国人若之何！”当时的英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都为约翰·丘吉尔的战绩

感到骄傲。安娜女王更是欣喜欲狂，将马尔巴罗晋封为侯爵，后又晋升为公爵。此外，女王将离牛津13公里的王室土地封赏给马尔巴罗，还赐给他黄金约50万镑用于在封地修建官邸。马尔巴罗修建了方圆20公里的庄园和豪华的住宅。为纪念胜利，住宅取名为布伦海姆宫。

马尔巴罗公爵家族一度因无男孩传宗接代，便与英国政治史上出现过许多显赫人物的斯潘塞家族结下了养子亲缘，所以后代便沿用了斯潘塞·丘吉尔的姓氏。1840年布伦海姆宫的主人是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也是英国的豪门权贵，他同伦敦德里伯爵的女儿结婚，并于1849年2月生下了三儿子伦道夫。这个伦道夫就是本书主人公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

童年的丘吉尔常把报纸上登载的父亲的演说、漫画剪下来精心做成剪贴册。那时的父亲伦道夫在政界的活动正值鼎盛时期。伦道夫在英国议会曾就爱尔兰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由于对爱尔兰问题伦道夫曾悉心研究过，所以他信心百倍地对首相、大臣在爱尔兰采取的错误政策进行强烈质询，终于导致内阁解散。新内阁组建时伦道夫被任命为印度事务大臣。

在以后一届又一届的内阁里，伦道夫一直升任到财政大臣兼下院总务，成为事实上的副首相。那年他

才37岁。他才华逸群，又能言善辩，所以早年能成大器也不足为怪。但是他成功之快捷使人感到惊讶。他的朋友曾忠告过他：“你的背后有来自政敌自由党的憎恨；你的侧面有来自同伙保守党的嫉妒，你可要当心啊！”事实果然如此。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过分大胆地推行了一扫昔日陈规旧习的政策，从而引起了保守党幕僚尤其是陆军大臣的强烈反对。伦道夫只担任了五个月的财政大臣就被革职了。

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在他写的《我的半生》一书中描写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他说：“我最先的记忆是爱尔兰……”

丘吉尔3岁时祖父马尔巴罗公爵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那时的爱尔兰还没有独立，自1880年被并入英国后反英暴动持续不断。丘吉尔的父亲想研究重大的爱尔兰问题，于是便充当了马尔巴罗公爵的秘书随同前往爱尔兰。幼小的丘吉尔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的里特鲁弗基公馆生活了三年。

在都柏林，丘吉尔到了该受教育的年龄，他不喜欢自己的家庭教师，也不喜欢上课学习，尤其是数学

怎么也学不好。

1880年祖父不再担任爱尔兰总督，丘吉尔提前一年返回了英格兰。7岁了，不愿上学也得上学了。父母为丘吉尔选择了詹姆斯教会学校。这所学校专收富家子弟，实行寄宿制。学校很讲排场，甚至安上了当时稀有的电灯。开学典礼那天，母亲送丘吉尔上学。母亲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啊！”可进了校门才知道这里对学生的处罚十分严厉，丘吉尔顿时产生了厌恶情绪。

一个月当中能有三、五次，校长把全校师生召集到图书馆，排好队伍，然后把任性的孩子拖到隔壁房间，用鞭子抽打他们，直打得他们鲜血直流。其他学生一边听着挨打的同学的悲声喊叫，一边颤抖不已。

一次丘吉尔因没写法语遭到惩罚，也许丘吉尔觉得法语太无聊。刚刚才7岁的孩子，背那些令人讨厌的语法实在不如读父亲送的读物《宝岛》有趣。《宝岛》可以由人海阔天空地想象着探宝的乐趣。

“叭！叭！”校长挥动鞭子抽打着丘吉尔的手臂和肩膀，丘吉尔咬着牙始终没有哭。他噘着嘴，紧绷着那长得像英国斗犬似的脸，斜眼瞅着校长。挨打时，他把校长的草帽抢下来，踏了个稀烂。其他学生则在一边都吓破了胆。自此，丘吉尔成了学校的英雄。但是，法语他还是连学都不学，所以成绩一直是最后一

名。

丘吉尔对此并不介意，他只盼望早点放假，回家用他收藏的几百个玩具士兵做战争游戏。詹姆斯教会学校的生活使丘吉尔生了病，他休学回到父母家中。在这所小学校他读了两年书。

后来他转入布赖顿小学。这里的女校长非常温和，也不学法语，而且可以骑马和游泳。丘吉尔首次领悟到学校生活的乐趣。有一次他患了肺炎险些丧命，但后来身体渐渐壮实起来。丘吉尔在布赖顿小学读了三年书。

小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哈罗中学的入学考试。试题是把拉丁语译成英语，丘吉尔对此一窍不通，他只是把名字写在试卷上，另外还写了一个号码“1”。过了一会儿，他在“1”的旁边填上了个括号，便什么也写不出来。在周围考生“沙沙”的答卷声中他呆坐了两个钟头。

考完试，试卷全部送到校长那里。校长看了丘吉尔的试卷大吃一惊，但他还是准许丘吉尔入学了。因为丘吉尔的历史、英语、作文等其他课目的成绩还是相当优异的，更重要的是他是马尔巴罗公爵家族的后代，是现任财政大臣的儿子，校长也不能不收他。但丘吉尔被编入哈罗中学最下等班级。

“瞧，财政大臣的儿子考了个倒数第一！”人们

这时都知道了丘吉尔是财政大臣伦道夫的儿子，于是便饶有兴趣地私下议论着。

可丘吉尔却对此毫不介意。他仍然不愿学拉丁文和希腊语，但对英语却下功夫学习。丘吉尔以后能著书立说，笔疾如飞，就是在这里打下的基础。丘吉尔的英语、历史、诗歌的成绩很优异，在文艺会上丘吉尔一字一句地背诵了1200行的长诗“古代罗马之歌”，因而受到了校长的表扬。丘吉尔喜欢游泳和击剑。他的击剑曾在公立学校运动会上获得优胜。

假期回家后，丘吉尔常与弟弟约翰一起用锡兵玩具做战争游戏。丘吉尔有1500个锡兵，可以组成一个步兵师团和一个骑兵师团，除此外他还有18门野战炮。

解除财政大臣职务的伦道夫被人称为政界的孤儿，不再参加重大活动。伦道夫了解自己的处境，所以暗暗地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儿子从哈罗中学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以后成为一名卓有见识的政治家，继承自己未完的事业。但丘吉尔的学习成绩实在糟糕，充其量只能去学法律，因此父亲不得已劝他去当军人。

丘吉尔并不晓得父亲的苦衷，他反而觉得父亲看重自己，所以感到十分高兴。可是丘吉尔没有想到两次参加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的考试，他都名落孙山。

丘吉尔还想再试一次，便进了陆军军官学校的补习班。在离开哈罗中学时，校长瓦尔特拉着丘吉尔的手，鼓励他说：“你好好干，前途无量啊！”丘吉尔受宠若惊，两次考军校都未考取的劣等生怎么谈得上前途无量呢！他心里一边纳闷，一边感谢老师的鼓励。

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三次考试终于及格，这时的丘吉尔已经十九岁半了。在军校他没有去步兵班，而是被分到骑兵班。因为骑兵班费用高，考试成绩好的都被分到步兵班，成绩差的才进骑兵班。

“桑赫斯特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丘吉尔以后这样说道。对丘吉尔来说，陆军军官学校使他天赋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里没有拉丁语、法语，也不学数学。这里有别人学不到的战术、筑城、地形学、军法、军政等课程。全体新生都从同一条水平线上出发。另外还学习体操、骑马，这可是丘吉尔的拿手好戏。军队里的教育和生活十分严格，其他的候补生不习惯学校的功课和训练，一个个累得愁眉苦脸。这样的生活丘吉尔却处之泰然，甚至为之陶醉。

此外，父亲让书店给丘吉尔寄去不少参考书，这使丘吉尔的学识日趋丰富。丘吉尔对战术和筑城兴趣最浓。爆破桥梁、修筑碉堡、侦察路线、绘制地图等方面他比别人确实更胜一筹。他非常喜欢骑马，为了驯服性情暴烈的战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但他毫

不气馁。他掏尽身上最后一个铜板去马店租马，在正常训练之外参加越野赛和障碍赛。因此，丘吉尔后来在书里这样写道：“不要给孩子钱花，与其给钱不如买匹马送给他们。”

桑赫斯特军校的生活结束时，哈罗中学的末等生这次在158名学员中名列第八名，一跃而成了优等生。他毕业成绩优异，并获得了陆军骑兵少尉的军衔。

就在这时，外出周游的伦道夫病倒在缅甸，他于是中止了旅游安排，返回伦敦，但病一直不见好转。

1895年1月24日年仅46岁的伦道夫哀伤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曾梦想和父亲一起以下院议员的身份参与一些活动，可梦破灭了。今后我要继承父业，决不玷污家门。”面对父亲的英年早逝，丘吉尔难过地这样说道，他一生都以父亲为荣，并以父亲为榜样，最终走上了政治家的生涯。

丘吉尔的堂兄这时成了布伦海姆宫的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因为丘吉尔的父亲已去世，为谨防万一，决定由丘吉尔在堂兄一旦出事时继任马尔巴罗公爵。丘吉尔的祖母——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的寡妇夫人担忧地对九世马尔巴罗新婚的妻子说：“你必须生下一个男孩，让温斯顿这个胡作非为的孩子继承爵位是不行的。”

幸亏新娘子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这不仅对寡妇

夫人是值得庆幸的，对全世界说来也是幸运的事。如果丘吉尔真的继承了爵位，就不可能成为日后英国大名鼎鼎的战时首相，因为世袭了贵族封号就不允许参加下院和竞选首相了。

二、军旅传奇

刚刚晋升少尉，正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丘吉尔渴望早日体验真正的战争。可是，打开世界地图，没有一个国家正进行象样的战争。英国自身已偃旗息鼓十余载，军队内大尉以下的军官没有一人亲身参加过战斗。

丘吉尔渴望冒险，他像过筛子似地进行了仔细调查。只有一处比较合适，那就是远隔大洋、位于加勒比海彼岸的岛国古巴。古巴是哥伦布发现的，当时为西班牙占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当地土族人组成了反叛军，进行着激烈的游击战争。于是丘吉尔与同样喜欢冒险的巴恩斯中尉一起来到了古巴。

抵达古巴时西班牙军司令部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丘吉尔问：“敌人在什么地方？”西班牙人告诉他：“到处都有，到处都没有。”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答复。丘吉尔和巴恩斯中尉第二天就出发上前线，他们找到了西班牙作战部队。部队分步兵、骑兵和炮兵，共计4000人。为追击行踪不定的土民游击队，他们每天汗流浹背地急行军。强烈的阳光照得人昏头胀脑，像蛇一样的长长的队伍出没于林海之间。一天

早晨，部队临时休息吃早饭，突然附近的树丛中出现了游击队，子弹像雨点似地射来。携带风声呼啸飞来的子弹掠过丘吉尔的耳边，一刹那丘吉尔以为自己倒下了，其实是子弹射中了他身后军马的胸部，马儿喷着血倒在地上。“谢谢你。”丘吉尔向给自己当了替死鬼的战马鞠了一躬。部队立即整好队形，向响过枪声的树丛包抄过去，可游击队连影子也不见了。

第二天照样去追踪游击队。形影无踪的游击队出奇不意地到处袭击他们。

丘吉尔和巴恩斯有时泡在河水里，有时在吊床上过夜。丘吉尔对行军不止的4000西班牙士兵感到怜悯，但同时他又同情游击队，他理解自己的祖国被外国人奴役的悲苦。

丘吉尔在炮火的袭击下，在军营里迎来了他20岁的生日。古巴从军的教训不知对他日后成为政治家起过什么作用，但有一点收获，就是丘吉尔在军旅中学会了吸烟，这成了他一生口不离烟的记念，而且他一生嗜好古巴雪茄。

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少尉所在的轻骑兵第四连队1896年秋季接受命令去英国殖民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驻守。满载1200名骑兵的输送船从英国出发，经过20天的海上航行，抵达印度的孟买。

初次观赏到亚洲的风光，丘吉尔觉得大开眼界。

丘吉尔觉得这里的生活十分惬意。清晨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印度仆人就来给刮胡子。6点去连队排队，然后进行一个半钟头的操练。操练结束返回宿舍，到军官食堂吃早餐。9到10时工作，午休睡到5点，然后愉快地去打马球。“我现在就是为马球比赛活着。”丘吉尔笑着对伙伴说。他确实喜欢玩马球，在部队里称得上一流名手。晚上总是玩得大汗淋漓，在宿舍洗过澡后去吃晚饭。月下一边吸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胡聊，到夜里11点才去睡觉。

这就是班加罗尔的生活。然而，当真丘吉尔每天都这样度过的话，想必他就不可能成为日后的伟大首相了。同别的素有教养的人相比，丘吉尔深知自己知识的匮乏，“若想不逊色于别人，只有充分利用眼下的时光。”丘吉尔暗下决心。他给伦敦的母亲写信，让母亲每个月都寄些书来，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柏拉图的《共和国》、亚里斯多德《政治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他哲学书籍和文学丛书……丘吉尔每天都要读上四五个小时。他独自闷头学习，自问自答，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去翻阅参考书，直到弄懂为止。就这样，学得的知识变成了丘吉尔的血和肉。以后他作为政治家具有洞察力以及作为文学家所显示出的博学多识，大概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

印度边疆发生了帕坦人的叛乱，英国派遣了三个师团。丘吉尔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一条消息，立即给英军司令宾登·布莱德将军拍去电报，要求批准他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将军回电：“军官无空缺，可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血气方刚并喜欢冒险的丘吉尔立即同印度《拓荒者》签订了担任战地特派员的契约。此外，他还同英国《每日电讯报》签订了合同，由他把战场通讯寄给母亲再转交报社，稿酬商定为每稿五英镑。

摇身变成临时记者的丘吉尔即刻启程，乘火车和小马车，经过六天长途跋涉，行程3000公里，来到马拉坎德的高山脚下。布莱德将军是丘吉尔家族的世交，对丘吉尔的到来表示格外欢迎。由1、2万人和4000匹马组成的讨伐队在高达2000米的断崖绝壁之中成纵队前进。积雪融化成冰水的湍流在深谷中奔腾倾泻，一步不慎就要粉身碎骨。

一天的黎明。讨伐队列好战斗队形向深谷前进。丘吉尔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远处的小山上好像有帕坦人的村落。骑兵们便奔向那里，生活在峰岭险峻的边远山区的帕坦人是勇猛的民族，他们立刻分散进行应战。战斗持续一个小时，这时步兵队赶到。战斗越打越激烈。丘吉尔翻身下了马，与步兵一起翻山前进。在酷暑骄阳下丘吉尔在满地残石碎砾的山岭中爬上爬

下，上午11点，下面的绝壁深谷横在眼前。这时，身缠白青布的帕坦人像猴子般敏捷地在岩石间跃窜跳蹦，不时地放枪。丘吉尔从隐蔽在旁边的印度兵手中拿过步枪开始瞄准射击。帕坦人的子弹嗖嗖地飞过耳旁，射击到岩石上叭叭作响，火花向四外飞散。突然丘吉尔发现一个帕坦人跑到已经奄奄一息的英军副官身旁挥刀乱砍，丘吉尔愤怒地颤抖着，这位哈罗中学的击剑能手“嗖”地一声拔出了长剑。帕坦人手提着鲜血淋淋的大刀站在离丘吉尔20米的地方，局势十分紧张。

丘吉尔突然收起长剑抽出手枪，“叭”一枪，没有射中，“叭”又一枪，帕坦人摇晃着身子倒了下去。丘吉尔猛然发现荒芜山谷之间就剩下他一个人，便急忙隐蔽在岩石下面。这时他才看到自己人在远处向他打手势，于是他撒腿向山下跑去。

同帕坦人的战斗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两星期之后才开始有成效，此时英方也死伤许多人。丘吉尔醒悟了，战斗绝非是蛮干冒险，每一分一秒都有生命的威胁。丘吉尔把这个时期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题目是：“青年军官”。这篇文章出乎意料地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连王子也写信来赞扬他。丘吉尔开始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树立了信心。

讨伐任务完成后，丘吉尔再次回印度的班加罗尔

服役。

不久，第三次冒险的机会又来临了。在英属非洲发生了虔诚的回教徒进攻约旦，使1、1万名英国官兵阵亡的事件。所有的军官都希望参加远征军，丘吉尔也不例外。但这次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这之前他写过一本书《马拉坎德野战军》，里面有批评英国陆军的内容，这使现任总司令赫伯特·基奇纳将军十分恼火。“乳臭未干的娃娃官竟然批评英国陆军，太狂妄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军官我们不要！”基奇纳愤愤地骂道。丘吉尔可不是那种遇到点障碍就后退的人，他开始各方面活动。首先说服了陆军部，进而又求总理大臣出面给基奇纳将军拍了电报，为自己求情。基奇纳将军哭丧着脸终于同意丘吉尔参加远征军，但他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由英国到目的地的旅费丘吉尔自己负担；一旦伤亡，陆军概不负责。

丘吉尔与《晨邮报》签订了合同，每篇随军报道稿酬15英镑，他拿到旅费后当即启程奔赴非洲。丘吉尔被编进第二十一骑兵连。连队横穿800公里长的大沙漠，日夜兼程，向尼罗河上游挺进。在非洲，基奇纳逐渐改变了对丘吉尔的成见，觉得这个小伙子值得信任。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和丘吉尔都进了英国内阁，一位任陆军大臣、一位任海军大臣，双双肩负起拯救祖国的重任。人的命运真是不

可思议。

丘吉尔在他的著作《我的半生》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战斗情景：“一个匍匐在我附近的回教徒挥舞着战刀站了起来。我向右边躲闪，在离他三米的地方向他连开两枪。正当我要把身子贴到马鞍上的时候，又有一个敌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枪口几乎触到了他的身体，“哇”的一声，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我的马蹄前，在左侧约10米的地方，立着一名身穿鲜艳服装、头戴钢盔、身披铠甲的骑士。我向他开了一枪，他马上逃跑了。我手握缰绳，骑在马背上向四外窥视着。”在丘吉尔笔下，他是一位远离战友、孤军奋战、勇敢沉稳的骑士。

丘吉尔写给《晨邮报》的从军杂记受到极高评价。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也越加充满信心，他开始考虑以文为生的事情了。丘吉尔虽出身豪门贵族，但经济上却并不富足。喜欢挥霍的父亲伦道夫直到临死前才刚刚还清债务。丘吉尔每年可从母亲手里得到500英镑，此外还有军人补贴。但既要支付几匹马的费用，又要打马球、交际，这点钱仍感拮据。过去他写报道和著作的收入很可观，等于一年收入的五倍。为了生活，丘吉尔开始考虑弃军从文，他打算当个作家，以后等有机会再从事政治。

从非洲回到班加罗尔，丘吉尔最后一次参加全印

度连队马球比赛。当时他不慎右肩脱臼，伤势未愈，但为了鼓舞士气，他把右手绑在身体上，左手持棒出场。丘吉尔所在的马球队终于取得了胜利，但对丘吉尔来说，难忘的班加罗尔的生活也结束了，丘吉尔离开军队返回伦敦。

丘吉尔一边等待涉足政界的机会，一边回顾与回教徒的战争，动手写了《尼罗河的战斗》一书。这部书里描写了基奇纳将军扒毁回教徒教主的坟墓，把他们的头盖骨装进油罐里带回来的情节。丘吉尔斥责这是野蛮行径，他认为胜利者也不该暴戾恣肆。

1899年6月，进入政界的机会意外地迅速来临。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去世需补选一名下院议员，丘吉尔被推荐为候选人。丘吉尔躊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人生新起点。但最初的形势对丘吉尔不利。虽然他父亲是奥德姆选区的当选人，并晋升到财政大臣的位置，但丘吉尔与选区的选民们却毫不相干。加上他的竞选演说不甚成功，初选时他以1300票的差距落选了。

10月份丘吉尔沮丧地回到伦敦。“算了吧，对自己这样的年轻人说来，失败乃成功之母。倘若从开始就事事遂意，今生今世倒反恐不顺。”丘吉尔这样想着并同时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政治。但这时的丘吉尔仍期待着冒险。

南非的英属殖民地又发生了骚乱。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吞并了荷兰殖民地开普，1877年又将荷兰后裔统占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占领了。1881年德兰士瓦当地民族布尔人奋起反抗英国驻军。英国勉强承认了布尔独立，把南非北部称为布尔共和国，南部仍为英属殖民地。如果维持这种现状，可能也就天下太平了。然而英国又一次企图吞并布尔共和国，重新把它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布冲突屡屡发生。更严重的是德国和荷兰支持布尔并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大炮、枪支和弹药。英国政府也准备付诸武力，向布尔共和国南部的纳塔尔和开普增派军队。

1899年10月布尔共和国向英国发出通牒，限令英国军队在两个月内撤离布尔国境，战争迫在眉睫。就在这时，《晨邮报》要求丘吉尔作为该报特派员去南非，月薪200镑，所需费用全部由报社负担。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优惠条件，24岁的丘吉尔爽快地答应下来。

英国动员了预备军，决定派大部队开赴南非，总司令由布勒将军担任。丘吉尔与布勒将军同船离开英国。在航行途中遇到了一艘货轮，在两船相错时，军舰用信号通知货轮，让它把南非的情况报告一下。货轮的船员在一块大黑板上写道：“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希孟德将军阵亡。”丘吉尔与布勒将军都大惊失

色，连部队将领都阵亡了，可见布尔军队的实力十分强大。

为了报道战争情况，丘吉尔一下船，就决定马上赶往前线纳塔尔，他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身临前线，却使他成为了英国的民族英雄。

11月15日，丘吉尔应邀与侦察队长霍尔登大尉乘装甲列车前去侦察敌情，他十分兴奋。临近前线能写出身临其境的真实报道，这是新闻记者求之不得的。可是当装甲列车开到20公里的地方，遇到了布尔人的袭击，不幸的是他们的六节装甲列车中有三节出了轨，而布尔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英军伤亡很多。

丘吉尔这时非常冷静，他首先稳住了火车司机，到了这般田地能让火车开动起来的只有司机一人，他手里握着全体英国官兵的生命。丘吉尔拼命说服了司机，在枪林弹雨中他与霍尔登去摘掉已脱轨的车辆，花费了整整一个小时。他一边鼓励士兵，一边把脱轨的车辆搬开，然后把受伤人员搬进车头或煤水车里。车头和煤水车慢慢启动，步兵们躲在车后，开始退却。车速逐渐加快，在地面上跑着的士兵一个个被拉上火车。

火车开到安全的地方后，丘吉尔又沿着铁道返回去救霍尔登大尉和剩下的士兵。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发现什么人都没有。突然，两个布尔人出现在他面前，

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布尔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丘吉尔被俘了。

三天后，丘吉尔被押送到布尔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收容所，他以身份非军人，是报社记者的理由要求赦免，遭到了拒绝。原来纳塔尔的报纸上报道过丘吉尔的消息，说他上蹿下跳，抢救机车和伤员等等。况且抓住一个英国贵族子弟对布尔人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所以说什么也不会放他。丘吉尔开始筹划逃跑计划。但是即便逃出收容所，到安全的葡萄牙殖民区还有450公里，怎样逃过去呢？丘吉尔似乎是白日作梦。但他打算先逃出收容所，下一步另想办法。1899年12月11日，丘吉尔、霍尔登大尉以及另一位军官策划越狱，但失败了。第二天又准备越狱。在丘吉尔写的《我的半生》中描写道：

“我穿过院子藏到厕所里，从窗口里我听到两名哨兵背朝着我在谈话。好，现在正是时候。我从窗户爬了出去打算翻墙，但由于心慌，爬了两、三次才总算爬了上去，可是，衣服被围墙的铁丝挂住，费了好大劲才解开。……一个哨兵划火柴吸烟，火柴在他双手中间燃烧。我悄悄跳进另一个院落，匍匐在草丛中隐蔽，这一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际。”丘吉尔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在等另外两个伙伴。过了一会儿，两个伙伴在围墙里用低得刚刚能听见的

声音说：“有哨兵盯着我们，逃不脱了，你走吧，祝你成功！”丘吉尔很失望，但他不能再等了。逃离收容所，必须穿过收容所院子，丘吉尔提醒自己勇敢点，照直向大门走去。丘吉尔极力抑制着逃跑的念头，佯装无事的样子悠闲地走出大门。竟然没有人出来追赶他！但不知什么时候丘吉尔腋下的冷汗已把衬衣都湿透了。丘吉尔沿着漆黑的街道向郊外走，等到天一亮，收容所一定会大乱，马上就会派人来追捕。丘吉尔穿着褐色囚服，口袋里只有 7 5 英镑，还有四颗巧克力。向南面走了两个小时，来到了铁道边，可以看见持枪的哨兵，不知这条铁路通往什么地方。过了约一个小时，沉沉夜幕下传来汽笛声，一列火车向这边驶来，丘吉尔顾不上多想列车是开向敌占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像鸟一样飞身跳上装满煤炭的货车车厢，精疲力竭的他不知不觉倒在煤堆上沉沉入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当丘吉尔醒来时，火车仍在奔驰，但这一觉使他恢复了元气。他跳下火车，白天藏身在树林里，一直到了晚上才敢出来活动。他又想搭上其他夜行列车，但是没有等到。不得已只得步行，他看到一所亮着灯光的房子，决定冒险去敲门，如果是布尔人，他肯定是完了。因为此时布尔当局已发出了通缉令，除了描绘丘吉尔的身形特征外，还悬赏 2 5 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丘吉尔后来听说后，心里非常

不快，因为在布尔人眼里他竟然只值25英镑。但幸运的是，开门的竟是个英国人，是这几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于是，这个英国人把丘吉尔隐藏了一个星期，并在另外几个英国人的帮助下，让丘吉尔隐身于一辆东行运送羊毛的货车内。火车摇摇晃晃地越过山丘，穿过沙漠，奔驰了三天三夜。丘吉尔怕鼾声引起麻烦，不敢睡觉。火车每到一个车站都能听到荷兰语和人们走路的声音。

火车终于轰隆轰隆地开过了国境线，进入了葡萄牙统治的地区，激动万分的丘吉尔再也克制不住，他大声喊叫起来，用手枪对着天空放了两三枪。

火车到达葡属洛伦索·马奎斯港，丘吉尔急忙向挂着英国国旗的英国领事馆奔去。领事馆沸腾了，人们都感到丘吉尔能够死里逃生真是不可思议。当天晚上，在英国武装人员的保护下，丘吉尔乘船赶往英国控制下的德班。抵达德班之前，丘吉尔越狱成功的消息已传遍了全球，因而，人们像欢迎凯旋的大元帅一样迎接他。港口里彩旗飘扬，乐队高奏凯歌，司令官和市民们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人们把他抬起来，让他在市政府门前讲话。贺电从世界各地飞来。《圣詹姆斯报》于1899年12月29日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丘吉尔先生……被人们抬在肩膀上下了轮船，并由一群仰慕他的热心人士用人力车把他从码头

拉到市区，车后跟随着一大群挥舞着英国国旗的欢呼喝彩的人。他来到司令办公室时又激起一阵爱国激情。大家都要求他发表演讲，丘吉尔先生欣然顺从这一要求……”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丘吉尔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惨重是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而丘吉尔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做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由于丘吉尔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英布战争有了深刻也更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写道：“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唯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要不就得收回这种乌合之众式的部队……这里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需要25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以尖刻的口气质问道：“大敌当前，难道那些英国绅士们都猎狐作

乐去了吗？为什么不多派一些轻骑兵来？为了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忠实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兵士，我们必须坚决作战到底。”丘吉尔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军方的不满。

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因为在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出对英国殖民政策以及对英军高级将领的批评后，陆军部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活动的命令，所以丘吉尔的请求使布勒将军有些为难。但他后来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丘吉尔编入在“开普殖民地”招募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丘吉尔为此十分得意，他对军旅生涯一直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到“我们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舒服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得异常充足”。他还给他的弟弟杰克在该团谋到一个军职；但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几个星期，杰克的腿就受了伤。丘吉尔把他送回德班，恰巧碰上由他母亲倡议在美国集资装备起来的医疗船“缅因号”到达这

里，他们的母亲也随船到达。杰克因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由于前段战争失利，布勒将军的总司令职务被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取代。丘吉尔要求从南非轻骑兵团离职转入罗伯茨的部队，但罗伯茨讨厌丘吉尔对此时已成为罗伯茨的参谋长的基奇纳将军的批评，使此事拖了许久才办成。虽然罗伯茨有意冷淡并明显与丘吉尔保持一定距离，却也并不过多地干涉丘吉尔对军事行动的采访，因而丘吉尔仍然给《晨邮报》发回了大量战地报道。

丘吉尔这时开始埋头写书。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他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四个月中就发售了15000本。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评论都强调他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以及此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1900年11月起，他在全国内进行演讲，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

大致相当的报酬。同年12月，他又到美国去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演讲。演讲的美国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但因为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加之组织者分成，他的收入比起英国来几乎少了一半。在纽约，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他主持了一次演讲会，使他收到了美国之行的最高演讲报酬150英镑。1901年1月，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10000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财产，他已经说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三、年轻大臣

丘吉尔在南非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使他成为当时英国名声极响的年轻作家，而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竞选下院议员，走向仕途铺平了道路。

1889年2月，丘吉尔尚未去南非之前，他曾收到兰开夏郡奥德姆城保守党下院议员罗伯特·阿斯科夫特的邀请信，建议他去该地参加议员补缺选举。丘吉尔欣然答应了。尽管丘吉尔全身心地投入竞选活动中，但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得票数位居四位候选人中的第三，因而落选了。这次竞选活动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我将决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的演说，一次接着一次的集会，一个晚上要举行三次甚至四次集会。我赶赴会场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响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与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地交替出现。”

1900年，索尔兹伯里首相解散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由于丘吉尔成为南非战争中的英雄，他在这次竞选中处于有力位置。此前当他刚刚逃离布尔

人的牢笼时，甚至连奥德姆选区许多支持自由党的选民都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在下次选举中“不管政局如何”都将投他的票。保守党人则充分利用他的历险大作文章，为他编写诗歌，谱写歌曲，由歌唱家在音乐厅里为他大唱赞歌。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出资400英镑作为他的竞选经费，而且答应每年捐100英镑给当地的保守党组织。丘吉尔的母亲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竞选，还出面动员保守党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奥德姆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丘吉尔为保守党赢得了一个议席，当选为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这一胜利令保守党人们欢欣鼓舞，但是保守党人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丘吉尔将是一位反叛的新议员。

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他坐在下院后排议席过道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排议员的后面；这是他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他在下院即将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新议员按照英国议会惯例要作的“处女演说”，是一位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重要环节。通常新议员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进入下院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但这位继承了自己父亲“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诨号的新议员不愿等待，就在进入议会仅四天即作了他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对首次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并尽力把演说内容全部背下来。好在演说的主题有关布尔战争，情况是丘吉尔十分熟悉的，因而背下来并不十分困难。人们对这位政治上的新星表示了普遍关注，在他发表演说这天，下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了听众。

丘吉尔的演说获得了成功，下院里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热情地鼓掌欢迎。但保守党高龄的领袖们却皱了眉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发表的看法与保守党主张把英布战争进行到底，严厉对待布尔人的反抗这一路线是相悖的。丘吉尔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并对布尔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他呼吁对投降条件规定得宽大一些。

曾为丘吉尔当选保守党议员出过力的约瑟夫·张伯伦此时可能顿生悔意，据说他听完了丘吉尔的演讲后，对邻座的议员耳语道：“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从丘吉尔的写作活动和政治经历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丘吉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政坛，除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之外，其先辈的政治业绩无疑是他从政的推进器和导航塔。祖先的荣耀，父亲的辉煌甚至于父亲的悲剧结局，无

不对他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从策略的运用，党派组织的选择以及行为方式的变换起着潜在的然而巨大的影响。至于与党的政策唱反调，以及在党内组织自己的小派别这些方面，丘吉尔的作为与其父亲如出一辙。而且，丘吉尔在叛逆时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

丘吉尔坚决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扩军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军费开支将增加一倍，会加重国内人民的负担，他在议会辩论这一法案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主张应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考虑增加军费问题，并且应将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适当地位问题放在英国整体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的高度来衡量，他认为英国防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最强大的海军”。他在演说中还援引了当年他父亲担任财政大臣时所持的观点，即应以“置身于欧洲大陆冲突之外这一愿望”为基点来考虑军费开支问题。

评论者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显示了他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军提案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复，因为保守党人当年将持相同观点的伦道夫勋爵推下了政治舞台。还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充军备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观点是与他维护并加强英殖民帝国的立场相矛盾的。公正地说，这些说法是由于不能透过表象去真正理解丘吉尔，甚至是

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了丘吉尔。

丘吉尔与他父亲当年一样，在政见上与保守党越来越背道而驰，相距日远。他的政治态度越来越靠近自由党人。丘吉尔自己早在驻扎印度期间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要不是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议会。”在这次扩充军队建制的争论中，甚至有一家自由党的报纸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政府首相。

有关改组军队的法案在议会内外持续讨论了两年。在此期间，丘吉尔进行了大量活动，还把自己关于这问题的演讲印成了小册子四下散发，最终使这一法案未获议会批准。丘吉尔的造反行动取得了胜利。在这过程中，丘吉尔逐渐与一些同意自己政治观点的年轻议员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由五名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人们把这个小集团称呼为“休里干斯”。不久，这个小集团的名字就被传得走了样，被人们称作“胡里干”了。

1903年5月15日，保守党人张伯伦发表了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演说，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张伯伦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杰出政治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各工业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激

烈竞争，已经在工业领域以及世界经济市场中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地位，曾经给英国资本主义带来巨大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即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争不加干预的政策，将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形势发展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张伯伦提出按照德国和美国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模式，组成英国及其领地的关税同盟，阻挡其他工业国商品的渗入，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工业。张伯伦的结论是，由此可能促使英国经济出现新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在张伯伦演说之后，丘吉尔很快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给首相阿瑟·巴尔弗写信说，如果首相不明确表示对张伯伦的谴责之意，那“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其实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因此引起保守党内部分裂并进而导致保守党政府垮台，总想通过协调的方式来消除党内的政策分歧，所以他给了丘吉尔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不久，丘吉尔又写信给自由党领袖班纳曼爵士，建议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在下院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但是，自由党人没有重

视丘吉尔发出的这个友善的信号。

1903年夏，保守党内阁由于在关税问题上出现尖锐对立逐步导致了自己的垮台，张伯伦9月9日致函巴尔弗，请允许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职务，9月15日，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也提出辞职。于是，巴尔弗着手组建新内阁，但在安排大臣职务时，巴尔弗根本没有考虑风头甚健的政治新星丘吉尔。因此，丘吉尔意识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不能寄托于陷入分裂的保守党，丘吉尔决心脱离保守党。

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1905年1月，他被保守党取消了党员资格。同年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但是，自由党议员们向他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一位著名的激进分子戴维·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更大的热情，两人自此成为好友。5月末，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位子。

丘吉尔继续在议会内外不遗余力地攻击保守党，他认为保守党的关税壁垒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

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他以极为生动的手法形象地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政策作了对比。他在讲台下先拿出一小块面包,向听众晃动着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时,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然后丘吉尔又拿出另块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啊!”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这部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于1906年1月2日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受到广泛关注,也得到了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鉴于丘吉尔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如此之深,并与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巴尔弗、张伯伦及其他一些保守党领导人的政治分歧是如此之大,他仍能较客观而深刻地对现实政治进行剖析,不能不使人赞叹。历史学家A·F·彼拉德认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1905年11月5日，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组织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保守党首相巴尔弗下台。在以后的10年中，将都是由自由党政府统治国家；而自由党人（加上在联合政府中）任首相的时间则长达17年。坎贝尔—班纳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为今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地位。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而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个出人意料，然而却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是上院议员。因此，丘吉尔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

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1906年4月，在下院关于南非自治问题的辩论中，丘吉尔主张与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是保证英国对南非统治稳定的头等大事。他的格言是：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

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他批评那些持强硬立场的人“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决定让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由丘吉尔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终获通过。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织新内阁。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阿斯奎斯首相特意把商务大臣提升为内阁大臣这个等级。这样，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的范围比较宽泛：贸易、运输、工业、劳工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消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乃至罢工的事件。丘吉尔为平息劳资纠纷制定了在商务部的第一项重要法规，就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保障劳工的最低合法收入。

1910年英国再次大选后，阿斯奎斯首相对内阁成员进行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以及政府中的分量更重了。丘吉尔担任了内政大臣要职。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送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就立即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

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丘吉尔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他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店主们坚决反对，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得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

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

在国际关系中，英国此时正面临着一场危机。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自称是“大西洋的

海军统帅”，不断炫耀武力并声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有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这说明英、法、俄与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丘吉尔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丘吉尔运用内政大臣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他与陆军部联系，说服他们派兵对存储在伦敦的武器弹药进行警戒，他频繁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与军方高级将领多次接触，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和英国备战工作的现状。

丘吉尔在广泛收集材料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就一旦德、奥与英、法、俄两方之间爆发战争时将发生的情况拟出一份颇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做了令人惊异的大胆预测，他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军部没有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对发生任何突发性事变毫无准备，“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

丘吉尔强调与德国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他将把对付这一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尔的态度令许多人、包括一些德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他在军费问题上出了名的“主张节俭的人”。德国人甚至因为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

爵未能看出丘吉尔态度变化而将其召回国。在为麦德尔尼赫伯爵饕行的晚宴上丘吉尔对他说，德国不应试图与英国进行海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将丘吉尔的备忘录印发给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并同意了丘吉尔的见解。1911年9月，阿斯奎斯首相撤换了备战不力的海军大臣，请丘吉尔出任，丘吉尔立即同意了。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在他办公室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经常乘坐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1912年1月，丘吉尔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务大臣具体领导。丘吉尔还下令

对参谋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将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作为培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就是由作战参谋部提出来，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予以采用了的。比如，对德国实行的“远距离封锁”就是一例。

丘吉尔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与海军部的传统行政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较严重的矛盾。海军部不同于商务部，它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丘吉尔认为这种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很糟糕的。他开始改变海务大臣们的职能，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丘吉尔的许多做法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大受欢迎。他提高了已有半个世纪没变动过的士兵薪饷标准，修改了军纪条例中的某些处罚士兵的荒唐规定，并为士兵升迁为军官打开了一条尽管还十分狭窄的通道，规定优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为军官。海军的《舰队》月刊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约一年后会撰文指出：“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在推动海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方面，他显然比他的前任做得要好，这一点是海军中从上到下都有目

共睹的。丘吉尔一改过去“主张节俭”的旧形象，大力主张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要压倒对方，因而提出了高额海军预算。

1912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上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这位被称为“恺撒”的威廉二世在讲话中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他还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1912年2月，丘吉尔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演说。他宣称，英国人从儿童开始就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精神准备，英国从来都不缺海员。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他特别提到海军对英德两国的不同意义：“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丘吉尔的演讲在德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满。威廉二世斥其为“狂人自大”；英国内阁中则有人认为丘吉尔说话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国新闻界对这篇演讲却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甚至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或许是……自1889年乔治·汉弥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1914年7月30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4日,英国内阁在得到德军已侵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决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当晚11时以前从比利时撤退;德国方面未予答复。晚上,丘吉尔在海军部与海军将校们以及一班秘书人员,手中拿着笔,等待着宣战时刻的到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此刻,许多内阁大臣都满腹失望的情绪,显得忧心忡忡。而丘吉尔则完全两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国歌声中穿过近卫骑兵检阅场,再次去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情况。据两次看到他去拜访首相的人说:“他的表情并不沮丧,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惊诧。他径直走了,就像一个人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一样”;他“面带笑容大步朝内阁房间走去”。

8月20日,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被德军攻陷。10月2日,伦敦得到消息说,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安特卫普,准备撤退到奥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尔、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经过商议后决定要求比利时政府坚守安特卫普。恰逢丘吉尔正要再次去敦刻尔克访问,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丘吉尔应在去法国期间到安特卫普转达

上述意见，并了解该地的军事形势。

10月3日下午丘吉尔到达安特卫普，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商谈。比利时人同意在该地坚守10天左右，以待协约国援军的到达。丘吉尔也当即命令敦刻尔克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先派两个旅来增援安特卫普。

10月4日，丘吉尔致电阿斯奎斯，请求准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并授予他在安特卫普的正式军事指挥权。基奇纳表示可以授予丘吉尔中将军衔；但首相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离谱，因而拒绝了这一考虑。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从前是一名骑兵中尉，如果接受他这个建议，他就有权指挥两名卓越的少将，更不要说准将、上校等军官了……”丘吉尔遭到拒绝后再次提出请求，坚持要求留在安特卫普。他实际上已将该地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军情报处长奥利弗将军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军务，并亲自冒着猛烈的炮火到各处视察。但是，内阁则要求丘吉尔立即赶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

1915年初，英国海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海军部的威望大大加强。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上提出了消除敌军入侵英国威胁的最好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战略思想。他还提出了在北海封锁德国各海港出口和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马尔马拉海的通道，进攻新近加入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

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人取得联系的两种作战方案。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各要塞的炮击于2月19日开始，并用战舰运送小股部队登陆，摧毁了海峡入口处的炮台，但由于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舰队司令S·H·卡尔顿指挥不力，行动极为迟缓。海军部很快以海军少将N·德罗贝克取代卡尔顿指挥这次行动，3月18日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进攻。英法军舰受阻于敌人的布雷区，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艘法国战列舰因触雷而沉没。德罗贝克决定推迟行动，等待与陆军发起联合进攻。但英国军队陆、海军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此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基奇纳此时认为西线可能需要某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支援，把原定加强远征军的第二十九师扣住不放。丘吉尔为此极为恼火，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强烈抗议。等到基奇纳终于同意放行第二十九师时，原来备用的运兵船队又已改派他用了，使该师直到4月中旬尚未开赴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误，土耳其军队得以喘息并巩固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协约国联军于4月25日重新发起猛烈进攻，但很难取得进展且遭到了重大伤亡，局势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

这种局势使达达尼尔战役成为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话题，也使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的反对更为强烈，

5月，他断然提出辞呈。首相阿斯奎斯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在与保守党领袖进行协商后，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而让其担任在内阁中地位较低的不管部大臣。这个职位“一般留给新进内阁的成员，或者留给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秘书马什认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当然是一出滑稽戏”。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则“害怕温斯顿无所事事会感到十分悲伤”，她曾写道：“那是对他多么可怕的伤害和肢解，把他从那里（海军部）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丘吉尔自己的体会则更为深刻，他后来写道：“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但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活像一只从深水中捕捞出来的海兽，或者像一个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险。”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持续了一段时间，战事毫无进展，拖到10月下旬，内阁最终作出了英军撤退的决定。阿斯奎斯决定将达达尼尔委员会改为作战委员会，但丘吉尔未被包括在作战委员会之中，于是他给首相写信说，他不愿养尊处优、无所事事。11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泰晤士报》称这次辞职演讲为“一次不容置疑的议会胜利”。

《曼彻斯特卫报》则称他的辞职为“公众一次重大的不幸”，为之而深表惋惜。这些公众舆论反应对丘吉

尔多少是一种安慰，但并不能彻底抹平党派斗争中的政治打击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伤痕。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在战争中一心扑在海军部的工作上，把党派之争放在一边。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谨慎。他既不笼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以致于阿斯奎斯在考虑组织联合政府时，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声明，如果丘吉尔不离开海军部，保守党就拒绝支持政府。而丘吉尔却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会提议吸收保守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在战争中他毫无保留地与保守党朋友一起坦率地讨论战时政策，甚至在他离职时，还推荐保守党领袖巴尔弗继任海军大臣。相形之下，丘吉尔比那些囿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们要高尚得多。当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政治圈外时，他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即将作为普通军人远征法国的悲壮选择，就是他以具体行动对那些擅长于运用政治手腕进行党派之争的两党政治家们所作的无声的抗议。”

在丘吉尔生命历程的这一阶段，虽然他饱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在婚姻与家庭生活方面却颇感美满如意，使他在涉足风云变幻的政治领域时，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依托的后方。

由于丘吉尔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强烈兴趣，

他在很长时间内极少与女性交往。虽然也曾与几位女性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都未形成更亲密的关系。正当他的朋友们以为他会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1908年8月15日的报纸上却登载了丘吉尔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订婚的消息。克莱门蒂娜的父亲亨利·霍齐尔爵士是一位军事作家和战地记者，于1907年去世了。她的母亲布兰奇·霍齐尔是艾利伯爵的后代，出身于著名的贵族家庭。虽然克莱门蒂娜一家生活较清贫，但仍使孩子们受到较好的教养。克莱门蒂娜是长女，她聪明、美丽，有知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阿斯奎斯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曾说她长着“第一流标致的脸蛋”，“很有姿色，无瑕可击”。报纸上也曾描述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满头乌发在额头中间分开，柔顺舒软地披在两边”。

丘吉尔很喜欢克莱门蒂娜，并以自己的勇敢赢得了克莱门蒂娜的爱慕。1908年夏天，丘吉尔和表兄弟弗雷迪·格斯特上尉正住在拉特兰的一家出租公寓里。一天深夜，公寓起了火，丘吉尔在救火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不仅担负了指挥职责，还冒险冲入火海抢救财物。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奇迹般地从房中逃出，在他双手抱着两个半身雕像跑出来的一刹那，屋顶坍了下来，如果再晚一秒钟，他就会葬身在瓦砾

堆中。”克莱门蒂娜知道此事后关切地致电慰问丘吉尔。丘吉尔回电说：“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乐趣。”此后不久，丘吉尔邀请了克莱门蒂娜到布伦海姆宫作客，在一次散步中突遇阵雨，他俩避雨到了宫殿旁的一座教堂中，丘吉尔在此向克莱门蒂娜提出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婚礼于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由圣阿萨弗主教A·G·爱德华兹博士和曼彻斯特教长J·E·C·韦尔顿主持。内阁大臣的婚礼是难得一遇的，因而，大约有1400人应邀出席了婚礼。丘吉尔夫妇收到了大量的结婚礼物，其中包括国王赠送的、带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婚礼进行得热烈隆重；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婚礼之后，新婚夫妇乘火车回到布伦海姆度蜜月，然后他们还到瑞士和意大利去蜜月旅行。

尽管有人认为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的婚姻不十分般配，但丘吉尔却对自己的妻子极为满意。他们俩终生相亲相爱，生活美满，这在英国政治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克莱门蒂娜性格外柔内刚，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装饰得优雅精致。尤为难得的是，克莱门蒂娜在政治上也是丘吉尔的好帮手。她能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使丘吉尔避免

因冲动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动。在丘吉尔参加竞选时，克莱门蒂娜不畏艰辛、不避危险地伴随着他；有时也在集会上为争取使他竞选获胜发表演说。丘吉尔反对妇女参政，赞同北爱尔兰自治，为此在竞选中多次遭到反对派群众的袭扰，有时只是因为克莱门蒂娜紧紧相随，才使丘吉尔得以免受更严重的冲击。在丘吉尔初掌海军部时，出于对新技术的爱好，也出于自身的冒险天性，丘吉尔自己学会了开飞机。由于克莱门蒂娜的多次要求，丘吉尔才最终答应放弃这一危险的爱好。在丘吉尔被免除海军大臣职务时，克莱门蒂娜直接给阿斯奎斯首相写信，信中为丘吉尔大声疾呼：“在你和那些曾与温斯顿共事的人眼里，他可能有种种过错，但恕我冒昧，他具有你的现任或未来内阁成员中很少具有的那种高尚品质——对德国战斗的坚强有力、富于想象和坚定不移。”就在丘吉尔决定辞职，准备远赴法国前线参战的重大关头，多数人都显得情绪忧伤，唯有克莱门蒂娜镇定自若，以她的坚强支撑着丘吉尔。

在与丘吉尔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克莱门蒂娜对自己的丈夫有了最深切、最彻底的了解，她对丘吉尔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以及杰出的才能都抱有极大的信心。因此，克莱门蒂娜不仅在默默地祈祷，祝愿丈夫能经历战火平安归来，她也希望丈夫能在政治上东

山再起。因为她知道，在丘吉尔看来，只有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英国人民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才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四、坎坷仕途

1915年11月18日,丘吉尔身着少校军服,乘坐一艘挤满假满归队的官兵的定期航班横渡英吉利海峡,再也没有担任海军大臣时外出巡视那样的派头十足了。在法国,丘吉尔被分配到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去见习。到部队后,丘吉尔发现官兵对他比较冷淡。但他不摆大人物架子,反而处处小心谨慎,努力搞好与同事或下级官兵们的关系,逐渐使人们改变了态度。他还要求下连队亲自体验堑壕生活,以便丰富自己的步兵作战经验。尽管这样十分艰苦甚至非常危险,丘吉尔也非常乐意去。有一次,他接到命令要他去见军长。他步行了五公里十分泥泞的道路来到约定地点,但接他的汽车没有来。当他怀着一肚子怨怒情绪回他的掩蔽部时,才发现这件令人不快的事竟使他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他所住的掩蔽部已经被德军炮火全部摧毁了。到了12月中旬,丘吉尔完成了见习任务,回到司令部,被正式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六营营长。

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六营的官兵大部分由低地苏格兰人组成。该营的军官几乎全是志愿兵。丘吉尔

与官兵们会面后发出的第一道指令是：“先生们，向虱子开战吧！”他们花了几天的功夫，把军营整顿得面目一新。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大家，使官兵们感到分外亲切。曾经是大人物的经历以及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又使他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丘吉尔十分努力地工作着，一天三次巡视防线，精心安排兵力部署，要求士兵加固掩体，以防敌人的火力袭击。他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铜盔穿行在阵地上，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勇敢机警。他经常对士兵们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他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当时在法国前线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这甚至令丘吉尔感到有些失望。他请他的老朋友，炮兵师长·H·杜德准将向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引来敌方的炮火打破战区的沉寂。更多的时候，丘吉尔不得不靠阅读随身携带的袖珍本莎士比亚作品和亲友的来信来打发寂寞的时光。许多要员来前线巡视时，也总要前来看望他。丘吉尔每次都拉着这些尊贵的客人一起去战壕里巡视，每当看到这些来访者名贵的服装被弄脏或划破，黑亮的皮鞋沾满了污泥时，总是令官兵们十分开心。

丘吉尔的一些朋友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部队，回到伦敦来。因为此时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内阁成员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丘吉尔此时回来，将

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有些左右为难。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难题。1916年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六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七营。由于第七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因而“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任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温斯顿·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四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

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战况的文件。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中主要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是丘吉尔的亲密朋友，他对丘吉尔相当了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

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但是，劳合-乔治最后还是冒着政治风险任命丘吉尔为战时军需大臣，这样，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这使他在性

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人们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首相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写道：“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定，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

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建立了军需委员会，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丘吉尔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毒气。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获成功。坦克不仅能碾倒铁丝网、跨越战壕，还能以强大火力压制对方而不怕对方的射击，战果十分显著。根据这一成功战例，丘吉尔建议扩大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部队。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在英国的文艺作品中，有人甚至称丘吉尔为“坦克之父”。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蒂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他们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他们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他们犯有过错的仆人宽宏大度；想到这些，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

战后，丘吉尔同时担任了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职务。这件事引起了报界的批评。《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

当时陆军部和空军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士兵复原。经过了长期战争的士兵们都渴望回家过平民生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陆军部制定的复员计划，出于对战后工业建设的急需的考虑，规定那些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有用的技术人才可以优先复员。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那些服役长、吃苦多、功劳大的士兵看着战争后期才参军的人却先回了家，心中极为愤怒。陆军的军纪几乎废弛，士兵们的怨恨转化为许多起兵

变。形势对丘吉尔来说极为严峻。丘吉尔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小、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丘吉尔概括其政策为：“在四个人中让三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四个人所担负的工作。”丘吉尔的计划合理而公正，深得军心。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丘吉尔在陆军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英国及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问题。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干涉。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主要目的是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他在丹迪市发表的竞选演讲中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断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丘吉尔的政策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

丘吉尔的计划受到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对，但他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宣称：“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阿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几年后，当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审问曾与丘吉尔会晤过的白俄军事代表萨文科夫时，曾问及英国大臣中谁给予白卫军实际支持最多？萨文科夫回答说：“是丘吉尔。他是陆军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尔给我看了俄国南部地形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着邓尼金的军队……，他指给我标示邓尼金军队的小旗子突然说：‘这就是我的军队！’”一个访问俄国的工党代表团曾带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记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访英时，丘吉尔曾答应他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愿兵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

评论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如果不为此而展开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了。”

人们曾试图找出丘吉尔极端仇视苏俄的原因。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统促使其对俄国大量消灭尊贵的公爵大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或许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的利益。丘吉尔一贯强调东方的危险。支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说过的，他认为邓尼会和高尔察克是英国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护者。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工党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让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1921年2月，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同时他仍兼任空军大臣。这时中东出现了严重的危急，丘吉尔对中东地区做出种种巧妙安排，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统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约500万英

镑。

1922年10月19日，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因为威望越来越低，被迫宣布辞职。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当保守党取胜的时候，丘吉尔却因患阑尾炎而入院接受手术。10月18日他的阑尾被摘除，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下台。丘吉尔不仅失去了他的阑尾，同时也失去了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而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丘吉尔自认为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保守党人早上还是丘吉尔的朋友和同僚，晚上就反过来成为他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丘吉尔以及他的政治伙伴们逐出政治舞台。丘吉尔对此感到愤慨，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迎战。就在博纳·劳组织新政府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之际，丘吉尔立即派出他的私人秘书到丹迪市为竞选运动作准备。

丹迪市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自由党人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自1908年以来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选，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严重贫困使选民们变得左倾，许多选民转而支持工党，种种因素使丘吉尔处于不利的局面。丘吉尔发现他的听众明显地存在敌意，“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

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投票前两天，一伙支持爱尔兰独立的年轻人，高唱着《向我讲老掉牙的故事》围困了丘吉尔，使丘吉尔大发脾气。大选结果，丘吉尔的得票数仅位居第四，惨遭淘汰。这是他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而且这只不过是他一系列竞选失败的开头而已。现在他发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官职，丢掉了议席，没有了党派，也割去了阑尾”。

此后六个月，他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1923年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他的《世界危机》第一卷，此书叙述了他自1911年至1914年在海军部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行文上生动，内容充实。书中还披露了大量政府尚未公开的秘密材料，这既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关注，又引起了下院及政府有关人士的诘难，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尔答复说，前任内阁大臣已有数人干过此事，却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因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923年，丘吉尔又参加大选，得票位居第二而再次落选。这次大选最显著的变化是工党议席持续增加，并超过了自由党，获得了191席。由于自由

党与保守党的政策明显对立而不可能联合，这就为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组阁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决定进行在自由党外部支持下建立工党政府的试验。丘吉尔对此感到震惊，他敦促阿斯奎斯寻求在保守党支持下建立自由党政府的可能。他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政权的上台将是一场严重的民族灾难，而这种灾难通常都是在战败后的翌日才会降临到大国头上的。”由于阿斯奎斯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丘吉尔开始考虑彻底脱离自由党。

1924年丘吉尔在无任何党派支持的情况下参加补缺选举，但保守党的主要负责人还是给予了许多支持，这引起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丘吉尔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危险的社会主义，主张保守党与自由党联合起来对付工党。有人指责他这时与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回答说：“如果说我能够诚恳地与保守党合作，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但是，这次选举丘吉尔以43票的劣势再度败北。

还有一件趣事。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这位幽默讽刺大师表示很想投丘吉尔一票，但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1924年工党政府垮台，10月再次举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也给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留下了极深印象。鲍德温致信丘吉尔说：“你对各党派的温和主义者能起到杰出的引导作用……，我们热烈欢迎你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你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选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78%，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几乎超出10000票。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战绩辉煌，总共获得了413个议席。工党的席位减少到151席。最惨的要数自由党，只剩下40个议席，从此后在议会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受命组阁，他决定起用丘吉尔。

对丘吉尔的任命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据鲍德温的传记记载，在会晤时，鲍德温问丘吉尔是否想当大臣在英语中，一般大臣都称为minister，只有财政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称Chancellor，或许这种区别显示了这两个职务的地位尊崇，只不过由于历史演变才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变成了“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担任的实际

上并不重要的虚职,由于鲍德温使用的是 Chancellor 一词发问,所以丘吉尔反问道:“是公爵郡大臣吗?”

“不,是财政大臣。”鲍德温回答。立刻,丘吉尔的热泪夺眶而出。财政大臣一职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刚刚从失败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对担任这一职务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此时梦想意外地变为现实,并使他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这一令人吃惊的转变,使他从几个月前既无党派,也无议席的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对此他不禁感慨万端。他不由想起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在英国政治中,财政大臣一职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曾经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最后晋身台阶。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使他有可能会穿上伦道夫勋爵任财政大臣时曾经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但是,这一职位又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

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也曾讲：“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窍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的弱点，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负，并且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总之，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自己的演说稿，并且“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立即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财政问题，就是恢复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采取这一政策，在战后英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一旦实施，将立即在国内产生重大的影响；弄得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经济复苏。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等各项政策。保守党人张伯伦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则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他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金本位制为英国财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一做法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这一做法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而提价使商品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12%的提价，英国厂商就得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

1929年5月，英国大选，丘吉尔以比过去更

为重视的姿态投入到竞选运动中去。他的全家都来为他助威：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了演讲，克莱门蒂娜为他主持集会，就连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女儿黛安娜也参加了竞选活动。最后，丘吉尔在选区当选。

就全国而言，工党是这次大选中的最大赢家。投票的当天，丘吉尔到唐宁街10号去，和首相一起利用自动收报机接收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当工党一个接一个领先的消息宣布时，温斯顿的脸涨得越来越红，火气越来越旺，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站到这台放在过道上的机器近旁：他耸起两肩，怒目看着数字，撕下纸条，表现出好像若要再听到工党获胜的消息，就会砸碎整个机器似的。他对周围工作人员突然地叫喊，粗俗得简直无法形容。”统计结果显示，工党获得288席，成为第一大政党；保守党仅获得260个席位；自由党获得59席。6月3日，鲍德温决定辞职。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再度登台。

保守党政府垮台后，丘吉尔在巴克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告别宴会”，与他的高级财政顾问们话别。尽管他在任时犯过一些错误，受到大量抨击，但他尽了自己的责任，干得相当出色。时间过得越久，人们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丘吉尔的错误都是一些“集体错误”，而且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是难以避

免的。而他的个人才干和品格魅力，则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最初对他颇不驯服的政务秘书格里哥对丘吉尔的卸任极感可惜，称他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的和多才多艺的人”；长期跟随丘吉尔的埃迪·马什更是倍感伤心。他们以及丘吉尔本人都没有料到，他此次离开政府到他下次重新登台将长达10年之久。

卸下了财政大臣重任的丘吉尔一身轻松，然而赋闲久了，也会百无聊赖，赋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一是写作，二是旅行及其他消遣。

写作可说是丘吉尔的老本行，每当他不担任公职时，往往致力于写作。他写作的方式不是动笔而是口述，习惯在构思时喃喃自语，一旦决定了如何遣文造句，便大声朗诵出来，让秘书用速记写下。他写书、著文、起草演讲稿都是如此。

早在他任陆军大臣时，就已开始写《世界危机》。到1921年初他所签订的合同已达数千英镑。《世界危机》共完成四卷，获得舆论的好评。到1931年他又出版了经过修订的《世界危机》的节略本，其中增添了一章关于马恩河战役的描述。他在这次离任后的一年内就为报刊写了40篇文章，其中一半以上刊载于《每日电讯报》。1930年9-10月，《新闻纪事报》连载了他的回忆作品《我的半生》，此书在10月出版时颇获舆论赞扬，丘吉尔在晚年时也曾

认为该书是他的最佳作品。1931年开始，他逐渐将酝酿了很久的一项计划付诸实施。那就是他一直打算写的一部关于他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传记。为此他开始了对古战场的巡礼，还邀请了有关的历史学家及马尔巴罗家族的后代。他写这部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澄清别人著作中述及他这位祖先生平时的一些虚妄不实之处。在这部传记中，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不吝笔墨地进行讴歌，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著名历史学麦考利对马尔巴罗公爵的猛烈抨击。在麦考利的笔下，尚未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是“靠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给的不光彩的赏钱过日子”的，“他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哄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年轻人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麦考利还指出，约翰·丘吉尔“在20岁时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此外，麦考利还指责约翰·丘吉尔有变节行为，背叛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而给敌人通风报信。丘吉尔在自己的书中对麦考利进行了“接连

不断的谴责”，甚至指责麦考利撒谎。他写道：“我们可以指望真理会很快战胜谬误，并在麦考利时髦的燕尾服上写上撒谎人几个字。”

一些历史学家不同意丘吉尔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但也给予了他一些肯定。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评论说：“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50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对一个在军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最权威的评价来自于20年后的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53年由该院院士S·席瓦兹宣读的授予丘吉尔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多处涉及对这部传记的评论。席瓦兹院士说：“在他关于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作品中，丘吉尔写道：‘说话容易且多，大事难做且少。’是的，伟大、生动、说服力强的语言也是难说且少。但丘吉尔已证明了话说得好也是成为伟业的特性之一。……”

《马尔巴罗：他的生平和他的时代》第一卷于1933年10月出版，内容从公爵出世一直写到1702年，书中包括大量的插图、书信文件的复印本、

作战地图等等，全书厚达600多页。丘吉尔原打算只写两卷，约20万字，结果由于搜集到的资料异常丰富，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最后成书四卷，总共约100万字。第二卷出版于1934年10月。最后两卷1936、1938年问世。这部传记的成功使丘吉尔获得了传记作家的尊称。

丘吉尔对历史的兴趣不仅表现在对他光荣的祖先的追溯和推崇，还在于对不列颠、对英帝国，以及对所有英语民族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他很早就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并想撰写一部英语民族史，以确认各英语民族的共同传统。这一想法终于在1933年成为事实。那一年他同伦敦卡赛尔出版公司签订合同，写一部40万字的《英语民族史》，并预支了20000英镑的版税。这项计划是他继《马尔巴罗传记》之后的一项巨大工程。30年代后期的欧洲形势变幻莫测，要在那种气氛下安下心来写历史颇不容易，不过丘吉尔似乎还有这样的本领。当1939年3月希特勒并吞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时，丘吉尔正在撰写17世纪后期的历史。到战争爆发时他已完成了50万字的草稿，而且大部分已排出校样。可是后来终于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一直等到二次大战结束后，到50年代后期才全部完成。

在撰写上述巨著的同时，丘吉尔还经常抽闲为报

刊写稿。他几乎可以定期收到报刊付给的稿费。他的文章不仅登在英国报刊上，还刊登在美国报刊上。他在1936年初替《世界新闻》写的一系列总题目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文章于次年汇总成册，以《伟大的同代人》为书名出版了。他为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的《旗帜晚报》写的系列国际问题的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于欧洲其他20多家报纸。后来也汇集成册，以《逐步》为书名于1939年出版，丘吉尔在卸任后这段时期的年收入约为20000英镑，比他当大臣时的俸禄多得多。

除了写作以外，丘吉尔以其广泛的兴趣作了很多消遣活动。譬如原来他就爱好驾驶飞机，这在任空军大臣时很容易就找到机会。有时因公出差飞渡英吉利海峡时，他便和驾驶员轮流驾驶。在一次驾驶飞机时发生事故，几乎摔死，他才放弃了这一爱好。后来他又改为打马球，但是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跌得一身青肿，被迫卧床一个星期，于是也逐渐放弃了。比较安全的消遣，对他来说可能要数砌砖和绘画。他很善于砌砖，时常在家院里需要砌砖的地方消磨一段时间，家中的围墙，游泳池等都有他砌的部分在内。至于绘画，则是早年培养起来的爱好，他认为绘画是真正的休息，可以顿时忘掉一切杂务，神经充分松弛。一般评论认为丘吉尔虽然对色彩有敏锐的感觉，对情

景也掌握得较恰当，可是技巧不行，因而画得很差。丘吉尔自己则对人说要是一天不画两幅画，他就会感到这一天白白过去了。而那人回答说，专业画家要是能在两个月内完成两幅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丘吉尔在这段时期的最大消遣，还是国外旅行。他在这几年中不止一次去过美国、欧洲大陆，还去过中东和北非。就在卸任的当年，他就和弟弟杰克以及他们各自的儿子伦道夫（18岁）和焦尼（20岁）一起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四人先乘船到魁北克，然后换乘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副董事长提供的一节专用车厢，畅游北美大陆。车厢中设备齐全，还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和侍从。这对一位卸任的大臣来说，是极为优厚的礼遇了。他们于9月进入美国，受到美国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巴鲁克的接待。在加利福尼亚州时又受到报业巨子赫斯特的招待，在他家住了四天，在好莱坞时，丘吉尔和卓别林交上了朋友，他建议卓别林演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影片，由他来写电影脚本。在巴鲁克的安排下，丘吉尔一行从洛杉矶又坐专用车厢，一路游览驶向东海岸。在首都华盛顿，丘吉尔会见了美国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

1929年夏，美国的经济状况正处于景气的高峰，所以丘吉尔最初看到的是一片表面上的升平景象。可是到达纽约后，正赶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崩溃，美

国开始了大萧条，丘吉尔在写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通讯中就有这样的目击记录：“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一位男子从15层楼纵身下跳，一下子就跌得粉身碎骨，引起了街上一大阵骚动。”

但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丘吉尔的乐观态度，他打算过一年再去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0000英镑。1931年12月，丘吉尔又来到美国，可是到了纽后，竟不幸遇到车祸，演讲计划不得不再度延期。发生车祸那天，他在所居住的饭店用完晚餐后，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去他家晤谈。当地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的靠左行驶，因此过街时没有先往右面看一眼。恰好有辆汽车驶来，未及躲让，便把他撞倒了。幸而骨骼未断，不过全身严重擦伤，脸部也有伤痕，而且受到严重震荡。丘吉尔虽遭此损伤，头脑却仍清醒。他向来到现场的警察说明事故全赖他自己，不应责怪司机。他被送进医院治疗，住了八天，到圣诞节前才出院。过了新年他又在妻女陪同下乘船赴巴哈马群岛的拿骚疗养，到1月底才回到纽约，开始实现他的旅行演讲计划。

在往后数年中，丘吉尔曾几度到法国度假，1934年下半年他还访问了巴基斯坦。1935年末至1936年初他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度过。1936年

夏天、1938年初、1939年初，他都到法国南部度假圣地小憩。他在卸任后的10年内，国外旅行活动相当频繁。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他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他写道：“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借口而拒绝文明社会为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政权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

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以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制裁。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但是，1933年，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

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虽然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1935年6月7日，鲍德温第三次出任首相。他对内阁只作了小规模调整，仍然没有考虑给丘吉尔安排任何职位。看来这位首相再也不愿意让难于对付的丘吉尔闹得内阁不得安宁。此时已满60岁的丘吉尔似乎很难

指望重返政府中去了。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看来，在1935年丘吉尔还是个没有前途的人。”

1936年3月7日，德国的希特勒突然宣布重占莱茵非军事区，制造了新的国际危机。丘吉尔感觉到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坚决主张英国应该在军事上有所准备。他同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座议员聚谈讨论英国如何重整军备问题，最后他们要求同首相谈一次，以便将他们对扩军的意见同鲍德温进行商讨。丘吉尔是主要发言人。他向首相提供了来自法国的最新情报，其中对德国空军力量的估计，他认为德国第一线空军实力已达到1236架飞机。丘吉尔着重指出，英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险。鲍德温虽然也承认英国在扩充军备方面已经落后，可是对丘吉尔提出的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仍予以拒绝。

这时，丘吉尔在下院的形象有所好转，各党都有人赞成丘吉尔扩军主张。很多自由党人现在也承认扩军的必要性了。工会领袖们以及知识界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先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赞成国联原则的保守党人也越来越把丘吉尔看作他们事业的斗土。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

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逊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逊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

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安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聪明之举是能够急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位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张伯伦上台初期，陆军大臣雷斯利·豪—贝利夏曾敦促他邀丘吉尔入阁。但是张伯伦担心丘吉尔进了内阁会喧宾夺主，未予同意。他对豪—贝利夏说：“如果我让他入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他甚至会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希特勒上台五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已充分暴露了他的扩张野心，这是张伯伦也看到了的。但是如何才能遏制希特勒，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张伯伦认为美国倾向于孤立主义，保持中立，英国不能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帮助作为考虑外交政策的基础，英国只能以法国为主要盟国，此外就得用一切办法减少潜在的敌人。艾登则认为英国很难主动减少潜在的敌人，因为德意日都明显地野心勃勃。要实现其野心，必然会侵犯英国的利益。为了对付其野心，英国必须同明显的友邦加强联系，包括美国。这也是丘吉尔的主张。在具体

问题上，意大利侵略了阿比西尼亚后，张伯伦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而艾登则反对让步，当首相和外相的政策分歧在内阁中进行讨论时，艾登得不到多少支持，所以他只能辞职。

1938年2月20日，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丘吉尔漫长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夜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直到清晨，“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丘吉尔从此便再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在艾登发表辞职演说时，丘吉尔“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在议会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也不再投政府的支持票，而采取了弃权的作法。在议会之外，丘吉尔得到了广

泛的支持。丘吉尔在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讲，反复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他还认为，在这个“大联盟”的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包括法国，也应该包括苏联，以共同抗击日趋严重的来自德国的威胁。

在30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斥《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希特勒1936年3月以少量兵力重新占领莱茵区的轻易得手，使他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1936年7月，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1938年3月，德国越过边界占领了奥地利。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也是蓄谋已久的。1937年6月，德国参谋部

就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声称德国有责任去保护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同胞。西方国家承认了德国侵占奥地利的事实，对希特勒加紧推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由于英法两国的姑息纵容，使德国进犯捷克斯洛伐克的步伐加快了。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大肆攻击捷克人；9月13日，捷克国内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9月13日深夜，张伯伦想充当唯一的和平缔造者，独自主动给希特勒发电报，表示了访问的意图。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在收到希特勒回电邀请后，张伯伦于9月15日乘飞机抵达慕尼黑。这一举动，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大为惊讶并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显然会削弱他们在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地位。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9月17日，张伯伦回国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動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以为只有这样才

能劝阻希特勒侵略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执迷不悟地对希特勒抱着坚定幻想，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应邀抵达伦敦，与张伯伦达成一致意见。两国在第二天即把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交给德国的联合建议文件送达捷克政府。9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会捷克总统贝奈斯，极力敦促捷克“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而希特勒则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的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

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9月27日晚，英国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英国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转来的希特勒主动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将进占捷克的时间推迟24小时，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

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慕尼黑协议满足了希特勒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只羔羊被推向屠宰场。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至伦敦。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文明时代的和平。”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丘吉尔在下院的辩论中发言，当他说：“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

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

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书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区，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这样，他可以集中兵力对付西部局势了。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9月3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

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就在1939年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彻底失败。

五、临危受命

波兰遭到德国军队大举进攻之后，英法政府并未立即作出反应，而是犹疑不定。当天下午张伯伦请丘吉尔到首相官邸，邀请他参加一个由六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第二天，丘吉尔给张伯伦写了一封信，指出张伯伦所提及的六名战时内阁成员，其平均年龄已是64岁——“只差一年就该领取养老金了。”丘吉尔在信中说，他本人刚过65岁。“如果你能把辛克莱（49岁）和艾登（42岁）也延揽入阁，那么平均年龄就能降到57岁半。”丘吉尔提出这一意见，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加强对抗张伯伦一派的力量。

1939年9月3日上午，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张伯伦决定邀三军各大臣都参加战时内阁，请丘吉尔任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表示同意。于是丘吉尔又回到了他离开了24年的海军部，当年的一批海军军官候补生现在都已成为高级军官。

就英德两国的海军力量而言，英国还是占优势，但是德国的潜艇十分活跃，对之不能掉以轻心。丘吉尔一上任就赴各海军基地进行视察，向各舰队的军官谈论防止德国潜艇和飞机袭击的重要意义。9月18

日晚，当他视察了北部的本土舰队，乘火车回到伦敦时，到车站去迎接他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德雷·庞德海军上将向他报告说，英国航空母舰“无畏”号已在布里斯托尔海峡被鱼雷击沉，全舰官兵约有半数死亡，达500名之众。德国海军的行动比英国海军快了一步。

丘吉尔决定让报界马上报道“无畏”号被击沉的消息，还决定尽早向下院做出报告。9月26日，他向下院作了报告，说明了英舰遭击沉的情况。他言词清楚生动、表达有力，词句中充满信心，使下院相当满意。反对党领袖也对报告表示欢迎。

10月，一艘德国潜艇潜入苏格兰北部斯卡帕弗洛海军基地的防御网，击沉了停泊在港口的英国主力舰“皇家橡树”号，786人丧生，包括舰队司令在内。这又是一大惨剧，对海军部也是个重大打击。丘吉尔由于上任不久，未被追究责任。海军元帅罗杰·凯耶斯爵士在议会中发言时说，“我认为，而且我确信全体海军官兵也认为，如果海军大臣阁下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获任就职，那么我国任何港口就都不会存在任何准备不足状况了。”海军将官们很清楚，防御力量薄弱正是张伯伦姑息养奸政策造成的后果，而丘吉尔则是姑息政策最坚定的反对者。

1940年4月8日夜，德军从陆海空三路进攻

挪威和丹麦，在挪威所有的主要港口登陆，包括最北面的纳维兑港。希特勒以所谓的“闪电战”，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丹麦。在挪威海岸沿线，英德海军发生了剧烈的战斗。4月9日夜，五艘英国驱逐舰驶入纳维克海湾，同德国海军展开了猛烈的轰击。英军击沉了两艘德舰，但在驶出峡湾时英舰也损失了两艘。形势对英国不利。当丘吉尔于4月11日在下院报告战局时，一来他太疲乏，二来也乏善足陈，表现得很难令人满意。尼科森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丘吉尔那次作报告的情况：“当他站起来发言时，显然他已经非常疲乏了。一开始他就摆出一副像往常那样的做报告的样子。可是尽讲些辞不达意的话，插进几句无力的嘲讽。我很少见他陷于更不利的处境中过。……他迟疑不决，手中的笔记弄错了顺序，戴错了眼镜，又在口袋中摸索那副对的眼镜，想说‘丹麦’可嘴里却老是说瑞典，以及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得令人痛惜。”

以后英国海军虽然又击毁了几艘德国驱逐舰，使德国的海上力量大为削弱，但是在挪威陆地上，从中部到南部都陆续被德军占领。挪威之战对英国不利之处甚多，如英军无滑雪部队，无冬季作战装备，对挪威的地形无作战经验等。挪威沦陷后，成千上万的英军死在雪地里，到4月末，英军只得撤离挪威。

挪威的军事失利在英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在议

会中，对张伯伦的领导作战的能力越来越怀疑，反对张伯伦的力量日益增强。5月7日，关于挪威军事行动的辩论在下院举行。下院的议员们情绪激昂，反对张伯伦继续执政的倾向逐渐趋于明朗化了。张伯伦的开场白在敌意的嘲笑声中被打断。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都以激愤的态度争相发言，矛头直指张伯伦。发言者们都博得了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议会大厅。

5月9日，丘吉尔与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他从伍德口中得知了张伯伦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并准备在必要时让出首相位置。一直对张伯伦忠心耿耿的金斯利·伍德此时也意识到张伯伦及其亲信不能很好地领导国家进行战争，因此他提醒丘吉尔说，如果张伯伦问及哈利法克斯是否宜于担任首相时，丘吉尔应保持沉默，对张伯伦的想法不予鼓励。

5月10日上午11时，丘吉尔应召来到首相官邸。应召而来的还有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和马杰森。张伯伦对他们说，鉴于工党的反应，他已不可能出面组织联合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提出辞职时，应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张伯伦问话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由哈利法克斯出面组阁，但马杰森拒不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两人之间由谁继任的问题上表态。丘吉尔也长时间一言不发，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

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哈利法克斯终于说话了。他已明白丘吉尔不愿由他组阁。而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组成联合政府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丘吉尔的掌握之中。一旦他拒绝进入政府，这些人就会被愤怒的群众风暴所埋葬。”因此这位被泰勒称为“绥靖大公”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说，由于他是上院议员，不适合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出面组织政府。这样，组织联合政府的责任就落在了丘吉尔的肩上。于是丘吉尔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以此巧妙地表明了他同意组阁的意图。

丘吉尔很快就接到了要他6时入宫晋谒国王的通知。他后来回忆说，在来到王宫后，“我立即被引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据国王自己的记载，似乎他真地以为丘吉尔不知道被召见的意图。但实际上，丘吉尔不仅对此十分清楚，

而且早就认为这一重任是非他莫属的。早在1939年8月中旬他从法国视察后回到伦敦时，他就请警官汤姆森对他提供特别警戒。他曾就此说明道“在那段等待时机的时间里，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此刻，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告诉国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领袖，他还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六个成员的战时内阁，在午夜以前，他将把至少五人的名单呈交给国王。

当晚7点多钟，丘吉尔约见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问清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后，建议工党应在政府中占1/3的职位。丘吉尔请张伯伦以枢密长的身份领导下院；请哈利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并参加战时内阁；丘吉尔自己担任首相兼国防大臣。接着他任命了政府各主要部门的领导人。丘吉尔留任张伯伦实际上有效地安抚了他所代表的一大批保守党人。此外，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分析的那样：“如果丘吉尔只能得到两个反对党和几个不安分守己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必然一事无成。他必须把整个保守党引导到自己方面来，而不是分裂这个党。无论如何，他是准备这样做的。痛苦年代的经验使他确信，必须取得组织的支持”。如果按反对张伯伦的人的意见，保守党大臣至少有1/3的人得辞职，而这对全国在战争形势

下紧密团结起来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丘吉尔认为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对立情绪继续蔓延。

当丘吉尔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时上床休息时，他有了一种轻松之感。他后来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可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10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5月13日，丘吉尔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宣布了政府的政策。他振奋人心地宣言道：“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

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为了避免新旧政府交替过程中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丘吉尔十分注重照顾张伯伦的情绪。他在11日就致信张伯伦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丘吉尔在海军部内部设立了他的临时总部，把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请到海军部作战室商议重大问题。

一开始，哈利法克斯认为丘吉尔知识面有缺陷，性格易冲动，担心他不能秩序井然地、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我怀疑白厅在看法上和办事速度上是否也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

丘吉尔此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军十分顺利，势如破竹，不仅荷兰和比利时人无法阻挡，就连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

也败下阵来，德军的装甲师团和轰炸机群蜂拥而来，从比利时境内越过阿登山脉和马斯河，于5月14日冲破了法军在色当和迪南的防守阵地，把法国第二军和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德军的这一胜利不仅威胁着被牢牢牵制在北部的盟军后方，也使东南部德法边境上耗资巨大、外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成为废物。5月14日晚，荷兰军队向德军投降。局势非常危急。法国总理雷诺给丘吉尔发来电报，声称法国陆军已顶不住德军坦克与轰炸机的联合进攻，请求再派10个以上的空军中队进行增援。但在第二天清早给丘吉尔打来的电话中，这位法国总理不再提要求增援的事，他沮丧地对丘吉尔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丘吉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迟疑了一下后他反问道：“不可能这么快吧？”但是雷诺在电话中几次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于是丘吉尔说，他准备当天亲自去法国与雷诺面谈。

此时丘吉尔已预感到法国将一败涂地，英国将失去最后一个主要的盟国。因此他在成行前，于5月15日下午起草了向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紧急求援电报。他希望美国虽然宣布非交战状态，但除了不实际派遣军队参战外，能尽一切力量帮助英国。他希望美国紧急提供战舰、战斗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丘吉尔说：“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

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

5月15日下午5时半，丘吉尔飞抵法国巴黎。在政府所在地凯多塞，他发现政府各部已在焚烧文件卷宗。他见到法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雷诺、达拉第、博杜安和甘末林等“都愁容满面”。丘吉尔询问“事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甘末林将溃败的惨状作了介绍，并说已无法进行反击了。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丘吉尔又问：“战略后备人员在哪里？”甘末林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一个也没有了”。丘吉尔被惊呆了，他后来曾对此写道：“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意外的事情之一。”

晚上，丘吉尔向几位法国领导人作了长篇讲话。他向他的同行们指出：如果法国被入侵和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他的这些话对雷诺产生了强烈影响，使雷诺增强了信心。

纳粹德国军队横扫欧洲大陆。由于战事发展不利，英国陆军部命令戈特勋爵打开通向海边的通道，命令驻守加来的英军坚守到底，从南边给予保护，以便从敦刻尔克“撤出尽可能多的人”。此时，沿海的许多港口都已落入德军手中或处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约40万英法盟军被迫收缩在敦刻尔克周围的一小块袋形地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似乎面临不可避免

的灭亡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希特勒在5月24日发出了要坦克部队停留在运河一线，停止向前推进的命令，使盟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重要喘息机会，争取时间巩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袋形阵地。

5月26日晚上7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861艘巡洋舰、驱逐舰、小帆船以及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据统计，前四天总共撤退了131606人。这四天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巍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使5月31日的撤退人数达到了68000人。甚至海军部地图

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们发出通令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到6月4日，共有338226名英法官兵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

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认为，“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最后他发表了这篇演讲中最精彩、最震撼人心也流传最广的著名战斗宣言：“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

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而此时法国的求和派与主战派各执己见，无法形成决议。雷诺提议请丘吉尔来就战或和发表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丘吉尔应邀于6月13日前往法国现政府所在地图尔开会。这是他自5月15日以来在一个月內第五次飞往法国了。当丘吉尔一行到达时，没有人来迎接他们，甚至他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自己借了一辆车找到法国政府的临时驻地。会议开始后，雷诺出人意料地提出，法国已经无法继续这场战争；他问英国能否解除法国在3月28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上的承诺，即英法在未经相互磋商和一致同意以前，决不单独进行停战或媾和的谈判。丘吉尔则激动地表示：“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将战斗下去。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也继续战斗下去。……不论怎样，英国政府准备继续抗战。我们相信我们定能粉碎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战争目的。我们

要永远摧毁这个制度，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来自它的和平建议。否则，这将是又一次的慕尼黑和布拉格被侵占。不，战争将继续下去。它只能以我们被消灭或我们胜利而告终。”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正视着雷诺，对他说：“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由于双方无法谈拢，于是丘吉尔要求雷诺先向罗斯福总统去电说明当前的严重局势，在接到回电前暂不作其他考虑。会议草草收场，丘吉尔当晚飞返伦敦。在此后的4年中他再没有机会访问法国了。

6月14日，不设防的巴黎被德国第十八军团占领。6月16日，法国雷诺的政府已陷入危机，雷诺宣布辞职。以贝当元帅为首成立了新政府，投降成了迟早的事。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讲中讲：“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已宣告结束。我们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这样勇敢地承担，以便在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补充了兵员和装备，然后大批集结起来，准备对英国发动进攻。墨索里尼在6月26日写信给希特勒说：“元首！现在到了对付英国的时候了。我向您提醒我在慕尼黑说过的意大利准备直接参加攻打这

个岛的想法。我已准备由陆军和空军参战。”新近迁到维希的贝当政府也可能作为德国的仆从向英国宣战。而当时英伦三岛的陆军，除了步枪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据估计，全国仅拥有各种类型的野炮不足500门，坦克450辆和25个空军中队。但是在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领导下，全国军民团结一心，镇定如常，努力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丘吉尔指挥部队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防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机动部队。7月，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亿3千万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药、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本来准备用干草叉和连枷来对付德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丘吉尔对可能遭到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观看军事演习，视察防御工事，他到海岛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泰晤士报》曾报道说：“在他经过一个小村庄时，人们很快认出了他，举帽和挥手向他致意。丘吉尔先生似乎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中，他对人们表示感谢，笑容满面……。首相

还视察了英国东北部的一个造船厂，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也很快被认了出来，人们大声向他欢呼……。工人的妻子聚集在造船厂的大门口，丘吉尔先生被热烈欢迎他的气氛所感动，大声问道：‘我们泄气了吗，’妇女们高声回答：‘不！’。”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我想，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在这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力支撑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用四个星期摧毁英国空军，掌握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为德军登陆扫清

障碍。然后于9月中旬实施登陆作战，9月以前占领英国南部，10月初结束战斗，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没有忘记玩弄和解的老把戏。7月19日，他在国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建议”并命令德国驻美代办寻求与英国驻美大使接触。丘吉尔于7月20日打电报给英国驻美大使馆说，“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22日晚，外交大臣奉命宣告：“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8月3日，德国又通过瑞典国王提出和英国政府商谈此事。丘吉尔除让外交部发表了坚决拒绝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任何和谈的正式答复之外，同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新闻界发表如下声明：“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决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决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弛。”

和谈阴谋失败后，德军加强了空袭的力度。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三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

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而这意味着他将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可能由此产生难以预料的危险和困难。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个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受伤。

在8月份，德国空军集结了2669架对英空战的飞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战斗机。8月5日，希特勒发出了加紧对英空战的第十七号令。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狂妄地认为，只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服。他从来没有把“海狮”计划看在眼里，一心进行“绝对的”空战。7月至8月初，激烈的空战都集中在英国南部的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上空。戈林和他的顾问们错误地认为，英国的战斗机中队都被吸引到南方来了。因此德国空军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工业城市进行白天轰炸。由于航距较远，他们只能用航程较长

但性能较差的“米110”式战斗机护航。英国空军对此早有准备，已将七个战斗机中队调来这一地区负责警卫。8月13日，戈林下令实施“鹰计划”，并预先连续几天猛烈轰炸英国的雷达站和空军机场。8月15日。大约100架轰炸机在40架“米100”战斗机的掩护下，对北方的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同时以800多架飞机空袭南方作为牵制。这天的空战是这一时期中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500里的战线上，进行了5次大的战斗。在北方，有3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有4名飞行员的“亨克尔111”式重型轰炸机，而英国未损失一架飞机，只有2名飞行员受了伤。指挥空战的道丁空军中将军的远见和指挥才能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赞扬，丘吉尔把他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在南方，英国所有22个战斗机中队全部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甚至三次。总的算来，这天德国空军损失的飞机为76架，而英国只损失了34架。战斗以德国的惨败告终。从此以后，没有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护航，德国飞机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在遭受这次挫折的同时，戈林放弃了对遭到巨大损失的英国雷达站的攻击；这被认为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到23日停止了五天。8月24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德国空军首

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从8月24日到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濒临被摧毁的边缘；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1/4。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将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严重的后果。

戈林对作战计划的胡乱更动，使为“海狮”计划作准备的德国海军参谋部迷惑不解。他们在9月12日的“战斗日志”中写道：“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掌握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袭击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海军参谋部不敢向德国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

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德国飞机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泰晤士河上几英里长的码头扔了大量炸弹，伦敦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第二天，又像这样轰炸了一整夜。据估计，仅这两天夜里，伦敦约有 8 4 2 人死亡和 2 3 4 7 人受伤，城市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德军也损失了不少飞机。9 月 1 1 日，丘吉尔向全国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指出：“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组，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9 月 1 5 日，德国空军集中了最大力量对伦敦进行空袭。2 0 0 多架轰炸机和 3 倍于此的战斗机群飞向伦敦。英国空军也全力以赴地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丘吉尔当天在设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第十一战斗机司令部里，亲眼目睹了空战情况，英国飞行员的英勇顽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晚他的私人秘书报告说，这天“共击落了 1 8 3 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 4 0 架。”后来丘吉尔曾写道：“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丘吉尔的这句话后来曾反复播出，广为流传。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并不严重，但对德军的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在伦敦遭受轰炸期间，丘吉尔几乎每星期都要抽出时间到被炸现场视察，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每当看到饱受摧毁的普通英国民众仍表现出抗战决心，丘吉尔总是为之深受感动。9月初，他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群众对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陪同他观察的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负责人伊斯梅将军后来写道：“他们哭喊道：‘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们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丘吉尔也回忆说：“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百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

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地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间，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在1940年中，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

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

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将“海狮”计划完全“搁下来。”“海狮”计划就这样破产了。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8月初，《新闻纪事报》公布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赞成丘吉尔领导的人占88%，怀疑的占5%，反对者占7%。这远远高于原来张伯伦所受到的拥护。此时张伯伦已经病人膏肓，9月底他已是生命垂危了。在逝世以前，他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和保守党领袖的位置。由哈利法克斯提名，保守党老资格的后座议员乔治·考托普爵士附议，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在几个月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泰晤士报》写道：“时间造就了‘不朽的时势艺术’，从近年来的政治史看，再也没有比预先对各类事件作出的估计更不可靠的了。”丘吉尔的老朋友、也曾反对过他的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当丘吉尔步入举行保守党大会的会议大厅时，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会者起立，热情鼓掌欢迎”。在澳

大利亚的大选中，两大政党争相把丘吉尔的光辉名字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大选中获胜的联合党的口号是“孟席斯（该党主席）同丘吉尔站在一起”，“支持政府就是支持丘吉尔”。

英国战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战略物资和购买战略物资的资金。英国参战时，有45亿美元的资产，包括美元、黄金和可折算的在美投资。后来通过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和向美国出售商品又增加了20亿美元。在宣而未战的“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节约使用美元；而当1940年5月以后，战况急转直下，此时上台的丘吉尔政府面对可怕现实，“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自6月以后，英国又把法国在英国的订购单全部接了过去，使其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1月止，英国按照一年前美国在废止中立法之后确定的“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贷款，支付了45亿以上的现金。剩下的20亿美元中，大部分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投资。而且即使全部卖掉英国的黄金和海外资产，也不够新近订货的一半货款，何况战事的发展必将使订货以10倍的需要增加，而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日常使用，还得在手头上留点钱。若是因为没

有钱就削减订单，这也是不能考虑的。丘吉尔认为：“归根到底，最大的节约就是缩短战争。”剩下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说服美国人尽可能地对英国给予援助。

11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德国对伦敦、考文垂等著名城市的野蛮轰炸，也激起了美国民众同情并钦佩英国人民的巨大热情。非常熟悉美国情况的洛西恩侯爵认为，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肯定正在寻找最适当的途径帮助英国，他劝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陈述英国目前的处境。丘吉尔与洛西恩侯爵一起商量的这封信的写法。写后又经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一再审核和经战时内阁批准，最终于12月8日定稿并立即拍发给罗斯福。

罗斯福在乘“塔斯卡卢萨号”前往加勒比海视察西印度群岛上的新基地时收到了丘吉尔的长信。在这封信里。丘吉尔对战争的总形势及其在新的一年中的发展作了展望，详细地说明了生产和运输两方面的紧急问题，以及德国飞机和潜艇袭击造成的危险，坦率地摆明英国财政的困难状况，并要求美国更迅速地提供更多援助。丘吉尔最后在信中说：“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

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在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利益的。……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予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据说，罗斯福坐在他的帆布椅上一再看这封丘吉尔自称为是“最重要的信”，然后绞尽脑汁，默默沉思。罗斯福得出的决策是“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英国使用。这样做，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大量先例可循。此后经过两个月的“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了罗斯福的想法。丘吉尔认识到“D D租借法案”一经美国国会通过，马上就将使整个局面得到改观。“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

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

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941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丘吉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五个转折点。其余四个为：一是法国沦陷；二是不列颠之战；四是德国进攻苏联；五是珍珠港事件。）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不列颠之战，为在法西斯德国野蛮的狂轰滥炸和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之下顽强抗击的英国人民的命运而担忧时，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英国人民不仅始终保持着沉着坚定的态度，而且对获得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始终抱着极大的信心。丘吉尔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在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而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这种英国精神及必胜的信念表达得更清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英国处于最危急，最困难时立下的这些誓言，就像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照亮了欧洲人民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在丘吉尔的多方努力下，英国终于争取到强大的美国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援助；但是迄今为止，美国仍

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英国作为屹立在欧洲的唯一反法西斯的坚强堡垒，仍处于长期孤军作战的境况中。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丘吉尔不仅率领全国军民进行了本土防御战。同时还指挥着海外的英联邦军队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同德意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由于法国退出战争，英国正承受着德国纳粹军事机器的巨大压力，法西斯意大利以为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中海、重建古罗马庞大帝国的“5000年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非洲大肆扩张。在1940年的7至8月，意大利已经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连成一片广阔的新领土，在这片土地上驻有40万以上的意大利军队和民兵师。而英国当时在北非的兵力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两个半步兵师，总兵力不超过5万人，防守着近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飞机也比意大利少。在这种众寡不均、兵力对比悬殊的态势下，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开始英军有意示弱并主动撤退，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突然发动了强大的进攻。1939年12月6日，约25000名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受过沙漠中的锻炼的全部机械化装备的英国陆军部队，被通知进行夜间长途奔袭的演习。他们全副武装在黑夜中挺进40多公里，清晨时又被命令整天一动不动地蜷伏在荒凉的沙漠之中。晚上他

们继续行军；第三天也就是8日那天，他们才被告知，这并非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日拂晓，西迪巴腊尼之战打响。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英印联军发起了进攻。仅用一个小时，就击垮了意军。英国军队在北非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全面胜利，5万英军竟然击溃了40万意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

在巴尔干半岛，墨索里尼在妄图征服埃及的同时，于1940年10月向希腊发动了全面进攻。应希腊政府的要求，英国海军接防了克里特岛天然良港苏达湾，并以此为基地，派飞机袭击意大利舰队和骚扰意大利南部。在英军支持下，希腊军队发动了反攻。11月22日，希腊军队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并使意军损失惨重。

由于墨索里尼的失败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希特勒下令德军进行武装干预。德军强大的机械化军队很快扭转了对他们不利的局面。德国也向北非派出了增援部队，这时，一位德国军事名将隆美尔登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舞台。1941年初，隆美尔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的司令。此前隆美尔在欧洲大陆的进军中曾取得了出色的战绩，表明他是一位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是一位胆大机警、作风顽强、敢下决心的军事赌博大家。隆美尔一到北非，便以优势的装甲部队将英军击溃。在撤退的过程中，

英军前线指挥官尼姆中将和他的顾问奥康纳中将同时被德军俘虏。隆美尔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了沙漠中。巨大的压力已经使韦维尔心力交瘁，在前线视察的内阁大臣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年。”

在5月3日晚上，丘吉尔又一次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并不掩饰局面的严重性，但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我们在纵观欧洲和非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在亚洲可能发生的事件时，难免是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千万不可失去判断的能力，以致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当我们以冷静沉着的目光注视着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时，如果回忆我们已经克服了的那些困难的话，新的信心便会油然而生。”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阿瑟·休·克拉夫的诗句“用以说明我们的命运”：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到1941年5月，尽管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也越来越明白，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三岛的可能性已日趋渺茫。德国人无法得到亦难以集结大规模渡海作战必需的船舶和登陆艇。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将使已经在质量上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了苏联。

当丘吉尔得到有关德国即将侵略苏联的情报后，他认为有必要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但丘吉尔的警告没能引起斯大林的足够重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苏联尽量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在许多事情上迁就德国。

6月15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总统：“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罗斯福通过美国大使怀南特口头答复说，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会帮助俄国。

6月21日是星期六，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

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怀南特夫妇、艾登夫妇和他的秘书们。丘吉尔在谈话中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人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6月22日晨4时，科尔维尔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了德国已经进攻苏联的消息。由于丘吉尔曾有指示，除非德国人侵入英国，否则不得因别的事叫醒他，因此到8时科尔维尔才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丘吉尔决定晚上9时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

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丘吉尔最后说：“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7月12日，英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署了对德作战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双方相互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双方均不同德国进行谈判，更不单方面同德国媾和。根据协定的精神，英国派出了两个战斗机中队到摩尔曼斯克，保护北方航线，另外还派军队去伊朗建立补给线并保卫油田不被德国人夺取。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丘吉尔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个人政务活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著名的英国工党政治评论家迈克尔·富特评论说：“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

与此同时，丘吉尔仍然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他预定于春季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会晤，但由于地中海战事使他无法脱身，罗斯福总统也因为忙于国内的立法程序而无暇他顾，致使这次会晤拖了下来。8月9日，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美国海军基地，在此同乘坐“奥古斯特号”前来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晤。这是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第二次握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曾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见到过丘吉尔，那时丘吉尔已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自然没能特别注意那位还不为人所知的美国年轻军官，对那次见面也未留下什么印象，这使对上次见面记忆犹新的罗斯福感到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被丘吉尔此次见面中对他表现出来的尊重所打消。对于讲究规矩礼仪的英国人来说，罗斯福总统是国家元首，而丘吉尔只是政府首脑，加上罗斯福传奇式的经历和所取得的巨大政治成就，使丘吉尔对他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因而对他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敬重。

英美两国领导人就德国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由于苏德战争减轻了苏联对日压力，而使日本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加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丘吉尔满心希望能和罗斯福一起制订抵抗日本进一步

侵略的共同政策，但因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罗斯福未能作出什么具体承诺。双方只是在拟议五点联合宣言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改后，共同发表了一项被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八点原则声明。声明表达了两方共同战胜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的问题。丘吉尔以及英国民众对这次会晤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失望情绪，因为，“在英国，人们原来期望这次会议将产生惊人的行动——会有浩浩荡荡的美国舰队迅速地驶过海洋——而结果看到的不过是一系列道貌岸然的词句。”

然而罗斯福没有想到，美国仅仅在3个多月之后就被卷入了战争。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损失还要更惨痛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

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愚蠢的日本人替他促成了。本来他和美国人都以为，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不会把美国变成直接的敌人。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在美国和不列颠掌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勇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日本的袭击将美国卷入战争，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最大的喜讯”。丘吉尔立即通知外交部，部署立即对日宣战事宜。

12月14日，丘吉尔乘坐新下水的“约克公爵号”，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

区建立联军司令部，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他随即指出拜伦的《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诗句证明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是多么恰当：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
都将永垂不朽！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而汇集其余22个国家的签字的任务则留给美国国务院去办理。宣言声明各签字国政府对英美两国共同发表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宣言宣称各国政府：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除了这一重大成就之外，丘吉尔还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受到热烈欢迎的演说；对加拿大作了短暂的访问。在此期间他有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引起了医生的注意。1月初，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休息了几天之后，于1月15日赴百慕大群岛，准备乘“约克公爵号”回国。但他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改乘送他来此的波音飞机飞越大西洋，这使他提前了一星期回到伦敦。

1942年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英国，与丘吉尔政府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前线引开至少40个德军师的前景问题进行商讨。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苏联红军

面对着400多万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所以斯大林多次提出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总统也认为有此必要，但丘吉尔对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一事一直有着更复杂的考虑，丘吉尔在原则上赞成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但他同时认为，“保卫印度和中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所承担的大英帝国的首要义是保卫印度不受日本的侵略”。同时，与其在欧洲大陆作，丘吉尔认为不如进攻北非或者解放挪威北部。

8月10日深夜，丘吉尔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

8月12日下午5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在“阴森而沉闷”的气氛中，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斯大林阴沉着脸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谈到10月准备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斯大林

对此转而高兴起立。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

8月16日丘吉尔乘飞机经德黑兰返回英国，英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公报随即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公报说：“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英苏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成相互的谅解。”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942年11月8日，盟军按原定计划如期发动了“火炬”战役，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指挥下“D D东部”特混舰队于8日凌晨1时在阿尔及尔顺利登陆并很快控制了局势，下午盟军已进入阿尔及尔市区。下午7时，已归附于德国的法军在指挥官达尔朗率领下投降。“中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少将弗里登指挥，在奥兰登陆时遇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后来由于

阿尔及尔的投降使法军丧失了斗志，美军装甲部队于10日乘隙突入奥兰南部，中午，法军宣布投降。由美军巴顿将军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比原定时间晚3个小时才到摩洛哥海岸，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开始时美军的进展缓慢，法军抵抗逐渐增强。美军一面巩固登陆据点，一面向东推进。11月11日，在获悉了其他方面投降的消息后，摩洛哥总督诺盖亦宣布投降。

斯大林得知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后，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非洲的军事行动再一次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也获得了巨大胜利。自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之日起，在经过4个月的顽强防御并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苏联红军于11月19日转入反攻。苏联以100万兵力、13500门大炮、900辆坦克和1400架飞机的巨大优势，于23日对33万德军形成合围。战斗进行至1943年2月2日才告结束，被围德军全部被歼灭。这次大会战宣告了德

国战略进攻的破产，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分水岭。

丘吉尔敏感意识到在巨大的胜利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不仅英苏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就是英美之间也有矛盾，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我与总统亲自会谈才能解决”。1943年5月4日，丘吉尔一行乘坐豪华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军政首脑在白宫举行了代号为“三叉戟”的秘密军事会议。其中最有意义的决定是，将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于英国以便在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实施决定性进攻。

丘吉尔会后飞往北非。这一消息导致了一场悲剧。一架由里斯本飞往英国的客机被德军战斗机击落了，机上13名乘客全部丧生，其中有著名的英国电影明星莱斯利·霍华德。其原因是该机起飞前曾有一个口衔雪茄烟的矮胖之人走向飞机，德国间谍误以为是丘吉尔登上了该机。

7月10日，代号为“哈斯基”的西西里战役开始了，运载着16万英美军队的3200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在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利用风狂浪涌的恶劣天气出乎敌人意外地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终于解放了西西里全岛。

一连串的失败导致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

的垮台。以国王埃曼努尔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及巴多格里奥为一派，以法西斯党内的元老为另一派形成了两个密谋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分别进行着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盟军的前进步伐和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加紧控制更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于7月24日开会，以19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的比数通过了解除墨索里尼军政权力的决议。连他的女婿齐亚诺也投了赞成票。7月25日，国王召见墨索里尼，宣布废黜他的一切军政职务，并立即拘禁了墨索里尼。巴多格里奥上台后，为了不招致德国的武力干涉，他表面上宣布继续对盟军作战，暗中却派特使与盟国密谈，准备反戈一击。德国人发现了一些动向，增派了军队，迅速包围罗马，迫使国王和政府成员逃往盟军占领区，成立了流亡政府。10月13日，意大利对德宣战。英美苏三国随即宣布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一方。

在意大利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期间，丘吉尔于8月中旬乘“玛丽皇后号”抵达魁北克与罗斯福举行会晤。双方首脑及参谋人员讨论了渡海在法国登陆作战的“霸王”计划。11月27日，丘吉尔与罗斯福飞赴德黑兰参加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首次“三巨头”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决定未来的作战计划。斯大林赞成英美的“霸王”计划并希望将该计划尽可能提前到

1944年5月进行，同时答应发动攻势以防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

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为了使德国人摸不清盟军登陆的准确地点和日期，盟国方面煞费苦心地利用各种手段迷惑敌人。这些因丘吉尔所说“真相经常应由虚假相伴来作保镖”的话而得名的“保镖”计划结果大获成功。德国人真以为登陆地点不是在诺曼底而是在加来，因而将他们的的主要防卫力量，包括大批摩托化部队集结于加来周围地区，从而使诺曼底的德军防卫力量相对变弱了。

1944年6月6日，在经过长期精心准备之后，人们盼望已久的“霸王”战役终于开始了。由盟军的大批轰炸机向海岸目标倾倒了几千吨炸弹后，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从20个英国机场起飞的3000多架运输机和滑翔机，向诺曼底海岸后的纵深重要地区空投了3个伞兵师；共约6000多艘大小各类战舰、运输船和登陆艇，源源不断地将部队和装备运往登陆地点。至了6日夜晩，将近10个师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各种武器已经上岸，后续部队还在不断涌来。

在“霸王”战役发动前夕直至战斗打响之后，德军方面仍蒙在鼓里。6月5日，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报告说西线不会有敌军进犯，然后就乘汽车回去与

家人团聚去了。6月6日，第七兵团司令杜尔曼将军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到125英里外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盟军空降伞兵被认为是声东击西的手法，西线海军向总司令报告说：“荧光屏上有大量黑点。”而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却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等德国人真正清醒过来后为时已晚。盟军迅速巩固，不断扩大滩头阵地，到6月12日丘吉尔亲临视察时，几个滩头阵地已连成一线。在战役最初的6天中，有326547人、54186辆军车和104428吨物资运上法国海岸。

6月11日深夜，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表示祝贺，电报说：“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得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这时，于6月10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也捷报频传。到8月中旬，苏军已打到东普鲁士边境，战争已日益迫近德国本土。希特勒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已无人防守。西线德军已损失近50万人，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更不要说空军了。”新任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战后在受审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月底就结束了。”但是希特勒还要垂死挣扎，纳粹当局强令15—18岁以及50—60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入伍，在9、10月间又征集了50万人投入战场。同时德国人还发射了大量V—1和V—2远程火箭轰炸伦敦和英国东南部，不过这一新式武器用于战争似乎显得太晚了，除了起到一定骚扰作用外，它对于盟军的攻势可说毫无影响。

1945年2月初，“三巨头”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第四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面带病容，受到了极好的照顾。会议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同时对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开得较成功，气氛非常友好。斯大林在宴会上向丘吉尔祝酒，称他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逝世，使丘吉尔大为震惊悲痛。他很想去华盛顿参加罗斯福

的葬礼并会见新总统杜鲁门，但最终未能成行而让艾登去了。

4月下旬，苏军包围了柏林，并在易北河与美军会师。4月29日，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司令冯·菲廷霍夫同意无条件投降。被德军营救出来当了一段时间傀儡的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并枪毙。4月30日，希特勒和刚刚与他结婚的爱娃·布劳恩在总理府地下室里一起自杀。5月3日，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邓尼兹海军上将派人会见蒙哥马利，商谈德军投降事宜。5月7日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签字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生效，当天又在柏林举行了正式批准仪式。参加仪式的西方盟国以及苏、德代表分别是泰德空军元帅、朱可夫元帅和凯特尔元帅。

5月8日，丘吉尔正式向英国人民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他跟在议长后面，由反对党代领袖格林伍德陪同，参加了下院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感恩节礼拜，然后他又应邀和参谋长们一起与英王合影，并和王室成员们一起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接受无数英国民众的欢呼。

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内阁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政府已持续执政5年，议会自1935年以来也已10年未大选了。丘吉尔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大选。5月

18日，丘吉尔在艾德礼的协助下，起草了一封名义上致艾德礼的信，请工党考虑是否将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为止。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多数人主张早日大选。丘吉尔在保守党内部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几乎全部同意7月选举，保守党人希望早日选举以便利用丘吉尔个人的巨大威望，于是丘吉尔将大选日期定于7月5日。

5月23日，丘吉尔正式提出辞职。随即应国王要求成立了看守政府。5月28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为退出联合内阁的高级大臣们举行茶话会时，老泪纵横地宣布：“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为了保证他在选举失败时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建议艾德礼陪同他参加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巨头”会议。

竞选在5月下旬开始。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除了阐述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外，还对工党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盖世太保的统治形式”。舆论对他由全国的领袖一变而为党派利益的卫士感到难以接受。投票日之后还需较长时间完成计票工作，所以丘吉尔于7月15日带领艾登和艾德礼参加“三巨头”会议。但丘吉尔觉得在得知大选结果之前他不能决定会议中的任何重大问题。17日，美国陆军部长向他透露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7月22日，

英美首脑联席会议正式作出对日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7月25日，丘吉尔一行回国，以便第二天公布大选结果时在场。本来丘吉尔对大选获胜一直抱有信心，但就在回国的那天夜里，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一刀似地”惊醒了，因而预感到形势不妙。第二天中午时分情况已趋明朗，尽管丘吉尔本人当选，但保守党却遭到失败，只获得197席。而工党在下院共获得了393个席位。在5年多战时首相位置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丘吉尔，此时只得黯然神伤地面对下台的现实。

六、晚年岁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这句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被丘吉

尔说出来，多少反映出他的无奈和气愤。

7月26日，丘吉尔正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请国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安慰丘吉尔，国王提出向他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在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太合适而谢绝了。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他为不能完成对日本的战争而感到遗憾，但他宣称：“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他很快搬离了唐宁街，因为他对抛弃了他的英国民众深感失望，使他“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

当8月1日议会复会时，丘吉尔在下院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了。他在走进议会时，保守党议员们高喊着“一个快活的好伙伴”来迎接他，但这喊声很快就被人数远远超过保守党的工党议员的胜利欢呼声所淹没。这使上丘吉尔深感不快。

丘吉尔在告别声明中的预言很快就迅速地兑现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

1946年初，丘吉尔将保守党的领导事务交由艾登代理，自己应邀前往美国。3月4、5日两天，他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座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作为盟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心目中仍保持着友好国家的形象，所以丘吉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的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

丘吉尔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

受劝告，他宣布，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战胜工党，重主国政。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他说：“工党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在社会活动之余，丘吉尔除画了许多写生、养了几匹赛马之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写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利用了许多官方文件和他与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私人通信及来往电报，经过思考梳理之后口述出来，由秘书整理出文字。美国的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首先得到连载丘吉尔此书的权利。这部巨著的稿费超过了丘吉尔此前得到的稿费之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在离任的这年中，丘吉尔衰弱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他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英国大选，保守党获321席，工党295席。丘吉尔再度被国王召见，奉命组阁。

1952年初，丘吉尔赴美与杜鲁门会晤。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丘吉尔访美时，他仍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

既往。”丘吉尔曾谈到他为何再任首相之事：“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决非因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1953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以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必须前往百慕大参加英美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只好由他妻子克莱门蒂娜代他领奖并致答辞。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获奖评语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辉煌的说。”

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最终没有成行。后来他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他已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华诞，除了家里按惯例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了特别祝寿会。各党议员送给他不少礼物，还有两块直径3英尺的大蛋糕。

丘吉尔正式辞职的日子是1955年4月5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并

向即将退休的首相致以良好祝愿。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了辞呈。丘吉尔搬出唐宁街10号时，《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祝贺的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1964年11月30日，丘吉尔度过了90岁生日。女王赠送了礼物，新任工党首相威尔逊也前来祝贺。全国和世界各地雪片般地涌来6万多封贺信、贺电。许多人来到海德公园街他的住所处看望他；他穿着战时式样的古怪服装向人们致意。1965年1月9日他卧床不起，第二天经医生诊断为再度中风。此后他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接连14天一动不动，仅有微弱呼吸。到1月24日，整整70年前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逝世的日子，一代英国名相温斯顿·丘吉尔渐渐停止了呼吸，走到了他伟大的一生的终点，享年91岁。

丘吉尔逝世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为他举行国葬。在英国历史上为一名平民举行国葬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第二次

是1898年为政治家格莱斯顿。丘吉尔的葬礼定于1月30日举行。此前议会休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瞻仰遗容的仪式。灵柩先由议院议长和3个政党领袖在四周守护，后来又换上国防和陆海军三军四位参谋长守灵。前来向丘吉尔表示敬意的瞻仰队伍据估计超过32万人。

举行葬礼这天，伦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气温只有四五度，寒风刺骨。但是天还没亮时，乘火车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已经在送葬的道路两旁围成了数百人的人墙。

午前9时45分，载着遗体的炮车由西欧寺大厅出发。这辆炮车造于1880年，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乔治六世四位君主的葬仪曾使用过，是颇有来历的。但是用它运送平民的遗体还是第一次。炮车上的灵柩用英国国旗覆盖，上面放着英国最高荣誉——嘉德勋章。议会大厦的钟声在阴霾的空间回响，泰晤士河也为之呜咽悲泣。

陆、海、空三军乐队轮流吹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送葬曲，一分钟发射一发的吊丧礼炮响彻冬日的天空。穿过议会广场，到达白金汉宫，令人难忘的首相府就在前面。11时45分，遗体到达圣保罗寺院。伊丽莎白女王及英国王室人员在圣保罗教堂等候灵车。以前为威灵顿和格莱斯顿举行国葬时王室的人没有参加。

美国原总统艾森豪威尔、苏联朱可夫元帅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丘吉尔并肩战斗的伙伴，西德总理艾哈德、日本原首相岸信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的敌人。昔日的敌人和战友竟汇聚一堂同本世纪的伟人进行最后的告别。人们唱着丘吉尔喜欢的赞美歌。葬礼直到午后1时30分时才宣告结束。灵柩又被放到炮车上。在又一次90发礼炮及哀乐声中以同样缓慢的步子向伦敦塔走去。灵柩被从伦敦塔旁边的栈桥上搬进汽艇。在19响礼炮声中，汽艇出发了。16架英国空军喷气式飞机盘旋在150米低空，向丘吉尔作最后的告别。

丘吉尔的遗体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滑铁卢车站被送上温斯顿·丘吉尔号特别列车，同他的亲人们一起回到离他出生的故乡很近的布赖顿教堂。

这里有他父母的坟墓。丘吉尔同双亲一起永远在这里长眠。

一代伟人丘吉尔去世了，但是围绕着他的争议从没有完全停息过。那么，如何看待这位创造和谱写世界历史的伟人呢？应该说，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也是一位经常被人误会和曲解的人物；他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但更具许多极为突出、超乎常人、出类拔萃的优点。对于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和崇高地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或许对他

最准确的评价出自对他最熟识的人。他的同事也是对手的艾德礼曾经很含蓄地评论道：“丘吉尔像一张多层饼，其中有一层肯定是包括了17世纪。18世纪在他说来是明明白白，还有19世纪，当然还有一厚层是20世纪。”盟军最高统帅和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样回忆丘吉尔：“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想要争辩过他确实是困难的。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